

社會學經典譯注

社會之經濟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著

湯志傑·魯貴顯◎譯注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

目次

中譯導讀 將《社會之經濟》鑲嵌進「新經濟社會學」	iii
一、主要觀點及可與「新經濟社會學」對話處的例示	vi
二、系統理論一般概念與進路的介紹	xxxiii
三、本書在魯曼著作中的位置、學界的反應及值得注意的 新發展	xliii
四、譯者說明與致謝	lxii
參考文獻	lxv
前言	3
第一章 價格	11
第二章 社會之經濟作為自我生產的系統	47
第三章 作為經濟系統內環境的市場	105
第四章 經濟系統中的雙重循環	155
第五章 資本與勞動：區分的問題	179
第六章 稀少性	211
第七章 作為溝通媒介的貨幣：論象徵的及魔鬼的一般化	277
第八章 決策行為的社會學面向	329
第九章 媒介與組織	363
第十章 駕馭的界限	389

附錄一	本書所收論文原篇名及出處	421
附錄二	魯曼其他與經濟相關的論著	423
附錄三	魯曼生平年表	425
附錄四	魯曼主要著作選錄	427
索引		435

中譯導讀

將《社會之經濟》鑲嵌進「新經濟社會學」

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是Granovetter(1985)發表日後普遍被視為定調之作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鑲嵌的問題〉以來，「新經濟社會學」在英語世界日益蓬勃，不但在1990年代初即獲得初步鞏固，逐漸成功制度化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領域，到了21世紀初，更儼然有蔚為顯學之勢。然而，這個環繞著「鑲嵌」的概念發展起來的研究進路，迄今仍無法有效解決其中一些根本的「理論」問題，以致雖營造了一棟巍峨的巨廈，卻有點像建在流沙上一樣，地基並不穩固，不時有倒塌的危險。

依個人淺見，魯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不但可以對此理論奠基的問題提供極具啟發性的解答，而且跟「新經濟社會學」之間也充滿了豐富的對話可能性。可惜的是，儘管魯曼在1980年代中期(與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約略同步)便發展出自己一套社會學的經濟理論¹，但在英語世界——並因此在台灣往往被逕行等同於世界——中²，迄今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以致兩者一直像平行線般，錯過不

1 詳見本文第三節的敘述。

2 這種我族中心的世界觀古已有之，不足為奇。正如「英語世界」的修辭所顯示的，各個社會都習於認為自身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現代社

少豐富彼此的機會³。相較於Luhmann其他專論功能系統的社會理論系列作品，如《社會之藝術》(2000a[1995]；2009[1995])、《社會之法律》(2004a[1993])、《社會之宗教》(2004b[2000])與《大眾媒體的實在》(2000b[1996]；2006[1996])已陸續有英譯或中譯問世⁴，開始引發國際學界的關注與討論⁵，由英語主導的世界科學系統持續

(續)

會的獨特性在於，結構上的現實與現象學式的世界圖像合而為一，以致現代社會真的就只能「世界社會」(Luhmann, 1982a; 1997b; Stichweh, 2000a; Tang, 2004: 673ff.)。換句話說，發生在這個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原則上)在溝通上都是可及的。此外，所謂的全球溝通更多是透過全球的網絡連結、一種環環鑲嵌的網絡連結而發生，而不是個互動位階的現象。考慮到這一點，有必要創造出網絡連結的可能性條件，才能讓系統理論跟新經濟社會學有效地對話，真正成為世界共享的思想資源，而不再局限於某地。

- 3 值得一提的例外是社會網絡的大師，同時也是新經濟社會學的先驅 Harrison C. White。雖然White基本上只能透過英文理解魯曼，但對系統理論有著相當的敬意與肯定(儘管其中自不免也有批判)，有別於新經濟社會學一般對魯曼的漠視。他曾於2005年訪問德國的Bielefeld大學，以「魯曼訪問教授」的身分授課，最近更風塵僕僕地遠道前赴歐洲，參加“Ten Years After: Niklas Luhmanns Die G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2007.12.7-8)這場紀念魯曼的研討會，發表“Networks and Meaning: Styles and Switchings”(White et al., 2007)一文，希望能促成系統理論與網絡分析進一步的交流。可惜的是，如Krippner(2001: 809, note 97)多少也觀察到的，新經濟社會學迄今主要是以White早期結構論的著作為參照點，而對*Identity and Control*(White, 1992)這本可謂是新經濟社會學中最具理論野心的著作不太感興趣。事實上，White(2008)最近還推出改寫過的第二版，並在前引文中清楚表明，這個改寫係受到系統理論的刺激，試圖與魯曼對話。
- 4 按《社會之經濟》的日譯本(Luhmann, 1991a[1988])早在1991年即出版。在政治方面，雖然《社會之政治》目前尚無英譯，但《福利國家中的政治理論》(Luhmann, 1990[1981])很早便有英譯，而且目前已有數本討論魯曼關於政治與法律理論的專書和論文集(Albert & Hilkermeier, 2004; King & Thornhill, 2003; 2006)。就是宗教方面，也有將魯曼早期的長篇論文以專書的形式英譯出版(Luhmann, 1984b[1977])，唯獨魯曼關於經濟方面的見解迄今仍無相關英文專書問世。
- 5 當然，翻譯也只是個起點而已。像Mathur(2005)便指出，儘管《生態溝通》1989年即有英譯問世，但在環保的領域中迄今仍很少被引用或討論。

忽視魯曼關於經濟如何運作的創見，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對照身為經濟社會學重要源頭之一的組織社會學對魯曼的肯定(Bakken & Hernes, 2003; Seidl, 2005; Seidl & Becker, 2005)，此一忽視同時也不免讓人感到納悶。

之所以如此，英語世界——尤其是美國——的學者一般多先入為主地認定魯曼是帕深思結構功能論的延續，以致連接觸、了解其理論的意願都欠缺(何況掌握系統理論的入門門檻極高)，是個關鍵的障礙⁶。這不但妨礙了英語世界一般而言對魯曼理論的繼受，對自始便企圖逃離結構功能論的典範牢籠，乃至是以批判其「過度社會化」的行動概念，及「經濟與社會」觀點起家的「新經濟社會學」來說⁷，自然更是如此。也正因為「新經濟社會學」選擇了這樣的出發點，更因為它自成體系，又與魯曼發展關於經濟方面的研究時間相近，以致有意無意間一直忽略後者的可能挑戰與貢獻。

6 另可參見Herting & Stein (2007)從「建構論」的角度切入，說明為何魯曼在歐洲遠比美國流行，以及Jacobson (1995)分析美國法律學者為何比較傾向接受哈伯瑪斯而不是魯曼的文章：因為他們可以政治性地運用哈氏的理論回應時局，卻很難用這樣的方式來援引魯曼。一些理論立場或者說「意識形態」上的差異，的確是導致英語世界較難接受魯曼的重要原因，像Blühdorn (2000)便毫不忌諱地說，魯曼的去世讓德國(!)社會學家「鬆了一口氣」，讓他們不必再面對如此具吸引力、如此全面而完備、理論上又如此一致，以致無法加以忽略，卻又無法苟同他未能關照個體的意義需要、未提供任何行動指引，乃至根本上便否定主體性的理論。但反過來，人類學家(如Gershon, 2005)卻開始注意到魯曼帶來的洞見，尤其是肯定把「人」從理論架構中移出去這一點。最後，King & Schütz (1994)提及對因果的需要、功能論、偏好以統一的個體為社會學分析的單位，及有別於一般社會建構論關於社會現實的看法，是理解魯曼的主要障礙，仍是個人迄今所見有關魯曼繼受障礙最完整的討論。

7 參見湯志傑(2009)。這篇探討新經濟社會學發展的文章原係本導論的第一節，惟因篇幅過長，在審查人建議下，現將它抽出另行發表，(下)篇將刊於同一期刊，尚請讀者自行參照。

以下，我將藉著把魯曼的理論觀點擺到「新經濟社會學」的討論脈絡中，來揭示系統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的可能對話之處，也就是從國際學界關於經濟社會學的最新發展來定位本書的貢獻。其次，我將介紹系統理論的一般概念與進路，幫助讀者掌握理解本書的關鍵鑰匙。然後，我將從魯曼本身的學思歷程來觀察本書的定位，進而介紹德國學界對此書的反應，以及系統理論的追隨者後續的新發展。

一、主要觀點及可與「新經濟社會學」對話處的例示

或是出於對韋伯及帕深思的敬意，有別於「新經濟社會學」明示的不滿，魯曼在本書〈前言〉中並未對所謂「經濟與社會」的觀點做太多尖銳的批評，但也明白指出這個觀點的不適之處，表明本書與此取徑的關鍵差異在於有著不同的(系統)分化觀念——正如《社會之經濟》的書名所明示的。在我看來，這個不同於社會學傳統的分化觀念，正是關鍵所在，有助於我們突破鑲嵌概念所陷入的理論瓶頸。

雖然分化一直是社會學的重要觀念(例如見Luhmann, 1985a; O'Connell, 1991: 804; Schimank, 2001; 2006; Sorokin, 1979)，但迄今仍欠缺適當的理解。打一開始，社會學主要便是銜接亞當·史密斯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以「分工」來理解分化。以涂爾幹與帕深思為代表的傳統，便是持此觀點，把分化視為某個功能上模糊、具擴散性(diffuse)的單位「分解」為多個功能上較特定的單位的過程。不過，社會學同時也把分化理解為一種結構，尤其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屬性，強調專殊化的好處在於提高效率或績效⁸。與前述想法相近，但又有

8 如Rueschemeyer (1977)及Piore & Sable (1984)早就指出，以及Piore (1996)的書評也觸及的，認為專殊化必定能帶來效率或績效的提升是有問題的。

細微與關鍵區別的，是Schimank(2001; 2005: Chap. 10)所謂「茁生」(emergence)的想法，也就是把分化理解為各自具有自主運作邏輯的不同領域的茁生。他認為韋伯是此觀點的代表，並把魯曼的看法也歸入此一流派，相對於以涂爾幹及帕深思為代表的「分解」的觀點。

然而，在我看來，魯曼與韋伯在看法上是有關鍵差異的。韋伯基本上還是遵循一種實體切割、非此即彼的存有論觀點，不同領域間因此是種零和的關係，同一對象沒有同時屬於不同領域的可能性，因為這違背特定物體占據特定空間的存有論想法。所以，不令人訝異，在韋伯那裡很快便會導出「諸神之戰」作為唯一的結論。有別於此，Luhmann自始(1970c[1964]: 39, 50, note 27; 1970g[1968]: 148; 1982b: 230f.; 1987f[1969]: 175f.)便把(系統)分化理解為「在系統中重複系統／環境的區分」，強調必須放棄存有論的系統概念，不能像社會人類學中的功能論一樣只看到系統內部的整合功能。

魯曼在本書(頁108以後，115)中便指出，隨著觀察者選取的系統指涉之不同，經濟系統這同一個存有論對象可以既是個系統，又是它的內環境(即市場)⁹。這種同時屬於不同系統、不同脈絡的可能性，在傳統觀念看來是個自相矛盾的弔詭，但弔詭恰恰卻是魯曼系統理論的出發點，因為這才是真正的現實——由具備自我指涉特性的社會在不斷的運作中形成的結果與現實。所以，有別於傳統「經濟」與「社會」分化開來成為彼此區隔的領域的想法，魯曼主張的是經濟系統「在社會之中」「分化出來」(Ausdifferenzierung)的觀念，也就是經濟系統「在社會之中」變得獨立自主，而不是變得「獨立於」(independent from)社會(Baecker, 2008: 111)。而且，分化出來意味著

9 事實上，如本書(見頁110以後，119, 131)也引用到的，the same is different (Glanville, 1981)是建構論的根本立場與觀點。

「實在的雙重化」(Luhmann, 2006[1996]: Chap. 1), 也就是令現實加倍了。

這樣的想法不但更準確地掌握到, 傳統的分化觀念所試圖掌握的經濟系統變得「去鑲嵌」的現象(變得獨立自主), 同時也正確地強調了經濟依然「鑲嵌」於社會之中的觀念: 經濟系統是「在社會之中」變得獨立自主, 換句話說, 仍然屬於社會¹⁰。相應於這種系統/環境「再進入」到系統之中的分化觀念而來的是, 任何使系統繼續往前並再生產它的運作, 都必須能夠同時使得系統與它的環境區別開來, 又能令它再度鑲嵌到它的環境之中(Baecker, 2006a: 110)。這樣的觀念不但讓我們能掌握到Beckert(2007)強調的, 應把Polanyi所說的鑲嵌理解為鑲嵌、去鑲嵌、重新鑲嵌的動態, 更重要的是, 能讓我們理解到鑲嵌/去鑲嵌不必然是種零和的關係(Luhmann, 1997a: 780)¹¹, 而是也可以在彼此的共同演化中, 隨著系統分化形式的改變而同時獲得強化、提升, 一如本書(頁14-15)提到系統的封閉與開放之間的關係一樣, 是種水漲船高、同進同退的關係, 而不是互斥的此消彼長的關係。所以, 對社會學來說, 重要的是分析在不同的系統分化形式下、在不同形態的社會結構下, 鑲嵌/去鑲嵌隨之有著怎樣不同的關係,

10 以往對功能論或系統論經濟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功能系統的批判, 多集中於認為他們持認同經濟的立場。這樣的批判不但預設了經濟與社會是組對立, 同時還在社會之中又區分了兩種關於社會的觀點, 例如哈伯瑪斯系統(策略行動)與生活世界(溝通理解)的區分(Baecker, 2008: 111)。這種對立的預設以及視為自明的兩種社會的觀念, 是有問題的(湯志傑, 2009: 166 ff.)。

11 雖然就其實質內容來說, Giddens(1990: 21ff.)「去鑲嵌」的概念同時意涵了「重新鑲嵌」(重新結構化), 但因為他把鑲嵌/去鑲嵌對舉, 且一定程度上把這對應於傳統/現代的區分, 因此往往讓鑲嵌/去鑲嵌顯得是種互斥的關係, 跟Polanyi一樣很容易讓讀者誤解, 而無法像Luhmann一樣更為深刻地掌握到鑲嵌/去鑲嵌其實可以同時獲得強化。

亦即有著怎樣不同的鑲嵌「形式」。鑲嵌的類型學無疑才是鑲嵌理論最主要的內容，而不是如「新經濟學社會」自Granovetter以來所關注的鑲嵌「程度」的問題(湯志傑，2009)。

系統理論之所以能超越傳統的理论與觀念，正在於魯曼敏銳地看到一系列這種以往被視為對立、互斥的區分的兩方，其實有著同時增強的可能。像社會學自始就傾向把分化與整合的概念對舉，或是把這視為互相制約、互補的過程(Spencer)，或是視為同一過程的兩面(Simmel)。就是Durkheim也不滿足於功能上的互賴會自動帶來整合這樣的假定，而強調規範的整合是功能整合的前提。帕深思承襲此一傳統且更為激進，把整合視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主張價值與規範體系是社會最重要的整合機構。此後Lockwood系統整合/社會整合的區分，以及Habermas系統/生活世界的區分，雖然提供了一套不同的理解問題的架構，但基本上並未重新概念化分化與整合，而仍是循著傳統的理解(Willke, 1987: 263)。

有別於此，魯曼認為整合基本上是個要被揚棄的概念。這不但是因為——如結構功能論常被批評的——整合的概念預設了共識與秩序的規範取向，同時也是因為整合預設了一個整合者，而現代社會卻是個多中心、多元脈絡的功能分化社會，不再有能代表全社會進行駕馭(本書第十章；Luhmann, 2001[1986])——遑論整合——的機構。事實上，分化不必然就會製造出所謂整合的問題，因為就如鑲嵌/去鑲嵌的關係一樣，(次系統的)獨立自主與(次系統間的)相互依賴也可以有同步提高的雙贏局面¹²。更重要的是，從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所

12 有鑑於此，考慮到社會學一時難以放棄整合的概念，Luhmann (1977a: 242f.)建議以消極的方式，把整合界定為避免出現某一次系統的運作造成其他次系統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樣的局面，後來更設法再次減低其中蘊涵的價值色彩，更抽象、也更中性地把整合界定為由於全社會系統的外部界

謂的去整合或不穩定根本就是建構秩序與達成穩定的必備成分，因為對具備自我指涉性質的系統來說，所有的穩定只能是動態的穩定、時間上的穩定。因此，在我看來，Schimank認為「分解」與「茁生」兩種分化的觀點雖常對立，但更常是互補，充其量只適用於韋伯。魯曼新的分化觀念毋寧是個概念上的進步，一個典範革命，因為這個新的觀念可以包含及解釋既有的觀點，反之卻不然。

讓魯曼能做出此一突破的一個重要關鍵是，他不再用部分／整體（以及相應地：自主／互賴）的區分來理解、想像分化（以及相應地：用系統的統一來理解、想像整合），而是一方面用系統／環境區分取代部分／整體的區分，另一方面用自我生產／結構耦合（*autopoiesis/structural coupling*）取代分化／整合的區分。在Luhmann(1984: 533)那裡，系統不再像以前那樣，是根據高度甚或全面的互賴來界定，而是根據系統／環境的區分或界限。隨之而來的「再進入」的分化觀念，則有能力考慮自我指涉與遞迴的問題，而不會像部分／整體區分雖明白預設了自我指涉的關係，卻不曾也無力正面面對它。

跟整合的概念類似，魯曼也盡量不使用自主性的概念，因為這很容易陷入始終說不清楚的「相對自主性」的兩難¹³。當不可避免要對自主性的概念做界定時，他採取一個相當激進，也相當罕見的立場，把自主性等同於自我生產、等同於（系統）運作的封閉：所謂的自主性

（續）

限，以及次系統的內環境對次系統所造成的自由度的降低，將整合的問題時間化(1997a: 601ff.)。關於以公共領域這套二階的自我觀察機制作為現代社會消極整合的機制，透過不斷擺盪謀求一與多的平衡的進一步討論，見湯志傑(2004a: 158ff.; 2004b: 220ff.)。

13 這可與Bourdieu做比較。Bourdieu一方面強調場域的（相對）自主性，另一方面又主張場域之間會有同構的情形，同時認為場域之間基本上是互斥的，同一實做無法屬於不同的場域，缺乏一個徹底的建構論與後存有論的轉向，以致無法成功跳出此一兩難。

「無非就是根據自己的符碼來運作，而之所以如此，無非是因為這一組符碼解除了自我指涉的弔詭」(Luhmann, 1985b: 6)。必須注意的是，在魯曼那裡，弔詭並非只是簡單的邏輯矛盾如「看見=看不見」，而是「之所以看得見，是因為看不見」。所以，「弔詭並不會就阻止了系統的運作，相反地，弔詭正是系統運作的可能性條件，因為運作的自我生產需要持續具有不同運作的現實性，需要實現不同的可能性」(Luhmann, 1985b: 18; 1995b: 42; 2001[1986]: Chap. 8 & 9)——就如本書(第六章)藉由分析稀少性的弔詭所顯示的。

在強調功能系統運作上封閉的同時，魯曼銜接上Maturana & Varela(1980[1972])自我生產的觀點，主張功能系統在認知上是開放的，而且正因為它們在運作上封閉，所以才有能力在認知上開放，同時也強迫它們開放(本書頁14-15, 55-56, 66-67; Luhmann, 1990d)。用系統理論的另一套術語來說，也就是功能系統在符碼上是封閉的，但就分派符碼值的綱要來說，對環境卻是開放的，如此方可結合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¹⁴，不斷地運作下去，求得一個動態的穩定化。此外，功能系統之間更可以有結構耦合的關係¹⁵，在窄化、限制環境中特定的系統對自己影響的同時，也因此使得這些影響變得更為容易。換句話說，結構耦合一方面增強系統間特定類型的依賴，同時又有效地排除其他類型的依賴；但它只保障了系統間的同時性，而未保證彼此的同步化。魯曼曾以「從類比到數位」的轉換這樣的比喻，來描述

14 參見後面關於「需要」的討論。

15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魯曼在本書的前言中提及要測試結構耦合的概念，但全書事實上並未直接提及或運用此一概念，因這是他當時尚在發展中的概念。此處係援引Luhmann(2004a[1993]: Chap. 10; 1997a: 92ff., 776ff.)後來較成熟、集中的表述來做補充。關於運作封閉及結構耦合的討論，另有Luhmann(1992a)的英文著作可參考。最後要附帶一提的是，魯曼後來也承認有運作耦合的情形。

彼此耦合的系統如何既區隔開來而又有所連結，結構耦合就像濾波器一樣，將原本類比的關係數位化，轉化為按功能系統自己的語言來重新編碼的、可理解的訊息，從而可以銜接得上自己的運作¹⁶。以經濟系統來說，財產與契約便是它與法律系統結構耦合的重要例子，文憑和證照則是它與教育系統的結構耦合。藉由這一整套環環相扣的概念，魯曼母寧是迄今唯一在理論上清楚且具體地說明了到現代的鉅變，導致了怎樣的「去鑲嵌」與「重新鑲嵌」的形式、其實質內容又為何的社會學家。

同時，魯曼不是只探討從傳統到現代的結構轉型而已，跟Polanyi一樣，他也注意到在不同的系統分化形式——他視此為社會的主要結構——中，會有相應不同的鑲嵌/去鑲嵌的形式。在他那裡，這主要是以涵括/排除這組區分來討論(Luhmann, 1997a: 618ff.)，亦即涵括/排除的條件是隨著全社會的分化(分支分化、階層分化、中心/邊陲分化、功能分化)而改變的¹⁷。有別於結構功能論及現代化理論的線性發展模式，認為隨著社會文化的演化，調適的提升、分化、涵括及價值的概化，必然是朝提高或增加的方向改變，魯曼關心的是彼此搭配的類型學。例如，在分支分化的社會中，涵括源自屬於某一支，流動的可能性很低，一個人如果被排除的話，存活的機率將急遽下降。在這種以平等、對稱為原則來組織的社會中，互惠是基本的規

16 魯曼特別提醒，常被忽略的結構耦合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系統內部必須有過剩的可能性，如此系統才有能力應付對其自由度的限制。

17 值得一提的是，涵括(inclusion)也是源自帕深思的概念，但就跟相互滲透一樣，經過魯曼一番徹底的改造。魯曼對此最主要的改變在於，必須把其對立面，把排除也一併考慮進來。唯有存在著無法加以整合的個人或團體的情況下，社會的凝聚才會變得看得見，也才有可能指定有關於此的條件。對此，進一步可參考Stichweh(1988)關於現代功能系統幾種不同涵括模式的討論。

範。跟Bourdieu(1977: 5f.)討論禮物經濟時一樣，魯曼也注意到時間在此所具有的重要角色，有助於將幾乎必然出現的不對稱弭平，復歸到相同或平等的狀態(Luhmann, 1997a: 649ff.)。但同時，魯曼也沒忘記社會學的傳統智慧，了解在分支分化及相應的涵括形式下，人們是以「整個人」(Vollperson)的模式來交往，所有的社會關係其實是糾結在一起，不但個人與角色間尚未清楚地分化開來，就是社會也還無法與互動清楚地分化開來(Luhmann, 1987a)。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魯曼的理論一方面能夠看到——如McGinn & Keros(2002: 447f.)的研究指出的——，對協商後果的影響來說，面對面的溝通可以起與(被理解為人際關係的)社會鑲嵌類似的作用；另一方面則跟展演論一樣，能夠看出現代的規約形式往往是在「隔了一段距離之外」來治理的(Fourcade, 2007: 1026)。因此，有別於「新經濟社會學」只專注於現代，或Callon(1998b)不注重特定時空脈絡的討論方式，系統理論能敏銳地觀察到在分支分化與功能分化社會中市場(與禮物)交換的同與異，注意到現代社會中「重新鑲嵌」的人際關係是受到「去鑲嵌」(經濟系統分化出來、結構上功能分化)這個前提制約¹⁸。

在建構系統理論伊始，魯曼便強調系統分化出來與其內部分化是互相依賴的(Luhmann, 1970i[1968]: 164f., 175, note 50; 1984: 261ff.; 1987f[1969]: 81f.)。「社會」——作為涵括一切溝通的社會系統——更強地分化出來，社會與互動更強地分化開來，在在跟它內部朝向功能分化的現代社會結構轉型有關。在功能分化成為社會主要的系統分化形式的情況下，人變成了社會系統的環境，再無法以「整個人」的方式參與社會系統(就是家庭也辦不到!)，同時卻獲得了可以藉角色

18 從這個角度來看，Montgomery (1998)引進角色理論的做法雖有其洞見，但與Callon (1998b)有類似的問題，並未考慮到不同系統分化形式下個人與角色間的分化有所不同。

參與多個社會系統的可能性。相應於此，再無法透過涵括，而是必須透過排除來界定個體(Luhmann, 1989a: 158f.)。也正是在這樣的結構條件下，人們特別喜歡談「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人被拋到環境之後卻更強地依賴社會的情況下，個體性的語意似乎恰恰履行了一個補償的功能¹⁹。

有別於把社會視為「道德事實」的做法，Luhmann(1984: 318)不賦予、也不訴諸道德整合社會的功能，而是從共同演化的角度來把握社會與心理(或所謂個人)系統更強地分化開來，同時也更加地互賴的關係。Luhmann(1977b; 1978a; 1984a: Chap. 6)以從帕深思那裡拿來改頭換面過後的「相互滲透」(作為結構耦合的特例)的概念，來指稱兩者間的關係，也就是兩個系統能互相提供自己的複雜性為對方所用。所謂的涵括便是指心理系統提供自己的複雜性供社會系統運用，而社會化正好是相反的情形，是社會系統提供自己的複雜性供心理系統運用。隨著從階層分化到功能分化的結構轉變，涵括/社會化(一如鑲嵌/去鑲嵌、在地化/全球化)同時獲得增強，就如Elias(1994 [1937])及Foucault(1967[1961]; 1977[1975])的研究也證實的。

把人視為社會的環境這個後人本主義的立場²⁰，是許多人無法接受魯曼理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如果我們在理論上認真對待社會與心理區分的問題的話，這將是邏輯上不得不的結論，而帕深思事實上也已朝此方向踏出一步²¹。因為如果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話，那麼相互滲透將變成指人們彼此有所重疊這種完全講不通的說法。帕深思之所以

19 相應地，系統理論會由此出發探討時尚、流行、品味，與消費等問題。

20 關於人與主體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見Luhmann (1992b; 1994a)，反對意見如見Martens (1991; 1992)。

21 就是採取網絡進路的White (1992: 8f.; White et al., 2007)也強調社會過程重於個人，不能把個人視為先在的原子，而應看做歷史過程中較晚出現的認同形式。

能比社會人類學的功能論傳統往前多走一步，即在於能擺脫存有論的預設，從一般行動系統的理論架構立論。要強調的是，社會與心理系統雖然互為環境，卻都是環境中有秩序、有觀察能力的系統，而不是純然雜多的環境。把人視為社會系統的環境，不就意味著貶低或輕視人。

此外，社會與心理系統雖然會在個別的元素上合致，也就是利用同一個事件，但這些元素、事件在不同的系統中卻有不同的選擇性與銜接能力。同樣地，就像個人可藉角色同時參與多個系統一樣，同一個溝通事件也有可能同時屬於多個不同的系統²²，而且這樣的情形隨著功能分化的到來而變得更為普遍。功能分化事實上就是多元脈絡的現實建構，每個功能系統都以自己特有的二元符碼進行全面性的世界建構(Günther, 1979; Luhmann, 1990c: 88; 1990d: 11; 2001[1986]: 62; 1990e: 11, 92; 湯志傑, 1998b; 魯貴顯, 1998)。所以，不同的功能系統(或所謂領域)間不必然互斥，只是相當程度上不相容(Luhmann, 1981: 246)。

在邁出後存有論轉向的一步，看到其他人迄今未能看到的「多重從屬的可能性」之外，與Callon(1998b)從framing的角度來討論禮物，與市場交易體制間的切換類似，魯曼也認為個人、施為者在選擇銜接上哪個功能系統的溝通，進入何種體制的問題上仍扮有一定的角色——儘管功能分化的結構會限定行動者的選擇可能性，儘管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會大幅提高行動者朝某一特定方向來界定情境的機率，使原本溝通機率低者變高，但終究沒有完全決定行動者的行動，

22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把Uzzi (1996; 1997)的研究成果重新表述如下：所謂的「人情」或「關係」與「無私的」市場關係是可以重疊而不互斥的，同一筆買賣既可以是市場或獲利為取向的經濟交易，也是建構友誼的媒介——只是這預設了一定的前提。

使其自由度變為零。就像本書(頁14, 注6)所舉的初出道的青樓女子必須學會迅速且清楚地讓路人意識到, 這究竟是個豔遇還是交易的例子所暗示的²³, 或是Luhmann(1981b[1976]: 38)在討論個人在互動中擁有關於是否進入法律溝通之「基本的主權」所明示的, 哪一種類型的溝通會被啟動, 仍有賴於個人的抉擇。

系統理論除了從分化的觀點, 對「鑲嵌」的問題提出一套理論上更為完整, 也更具說服力的主張外, 還正面探討了價格、市場、資本與勞動、稀少性、貨幣、決策及組織等議題(本書第一、三、五、六、七、八、九章), 真正深入經濟學的核心領域, 並提出一套與之不同的(社會)理論, 實現「新經濟社會學」的宣稱與渴望²⁴。其中, 自然也蘊涵不少可與「新經濟社會學」對話之處。事實上, 魯曼關於市場想法的靈感, 主要便來自White(1981)的刺激。然而, 有別於同樣承襲White市場觀念的新經濟社會學只關注市場作為社會結構(生產者之自我生產的角色結構)的一面(Fligstein, 2002: 63)——這相當程度上或是受到網絡進路的影響, 魯曼除了把市場看做自組織的相互觀察的結構, 更強調它作為二階觀察機制的角色, 視之為經濟系統運作的動力所在²⁵。

這樣的觀點不但可以與Callon(1998b: 32)視市場為過程, 以及

23 習於經驗研究取向者或許會覺得這怎麼可以當作「經驗的」例證。我同意這樣的質疑有其道理, 只想提醒這樣的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因為經驗研究通常也只會看到經其觀察架構篩選過後的東西, 如果沒有這種理論指引下的問題意識, 實際的經驗研究不見得會敏感於領域分化的問題, 從而提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關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討論, 可參見Ahlemeyer (2002 [1996])的研究。

24 Krippner (2001: 776, 795)甚至一度嚴辭批判, 認為鑲嵌概念的流行使得市場被忽略, 變成個殘餘範疇, 或是逕自將之等同於聯繫(ties)。

25 雖然Leifer(1985)便已提倡從市場作為機制的角度來銜接White的想法, 但這樣的觀點在新經濟社會學中似未普遍被接受。

Zafirovski(2000)視價格形成為社會過程的觀點比較、對話，魯曼這種抽象的界定還有兩個好處。一方面，它可以與既有(往往側重經驗研究取向)的理論觀點相容、會通或甚至加以綜攝：不論是政治—文化的取徑(Fligstein, 1996; 2001)或地位訊號論(Podolny, 1993)，還是現象學或微觀社會學的進路(Knorr Cetina, 2006; Knorr Cetina & Preda, 2005)，乃至模仿(Orléan, 1989)與互為主體性的取徑(Fullbrook, 2002)，皆可為此一抽象的界定所涵蓋²⁶。另一方面，這還可以與其他的社會領域比較，讓人意識到所有的功能系統都具有某種二階觀察的機制，進而提出一套完整且邏輯一貫的現代社會理論：偶連性是現代社會的固有值，在功能分化必須自我奠基的情況下，只能藉由二階觀察的不斷擺盪，暫時凝結出相對穩定的取向與結構，結構本身其實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Luhmann, 2005[1992]: 123ff.)。

雖然和經濟學同樣從視市場為價格形成機制的觀點出發，魯曼卻可以提出一套真正與之有別的替代理論。魯曼明確地指出，在無法直接透視消費者需要的情況下，廠商實際上是以觀察彼此的方式來做決策的。正是在這樣一個相互觀察的背景下，所謂的鑲嵌與網絡才會扮有一個角色。所以，市場必定是個二階的現象，在此，生產者彼此競逐著交換的機會。有別於傳統把市場看成系統的想法，藉由把市場視為經濟系統的內環境，系統理論有能力探討對經濟學及古典社會學來說都是重要的概念，但新經濟社會學卻多加以忽略的「需要」(needs)的問題。市場作為經濟系統的內環境，實際上也就是作為經

26 Baecker (2006b: 98ff.)便指出，系統理論精準的建構論進路，最適合用來綜合三個都在研究市場且有重要洞見，但迄今尚未有太多交流的取向，帶來更為豐碩的成果：一、Luhmann立基於二階觀察觀念的市場概念。二、新經濟社會學中主要是經驗研究取向，視市場為角色結構的研究(如 Fligstein, Podolny)。三、White關於市場網絡結構及不同市場類型的研究。

濟系統的「邊界」(boundary)與介面(interface)，不斷把經濟系統外不確定的複雜性轉換成內部確定的複雜性，把異己指涉轉換為自我指涉。相應地，市場的建築結構(architecture)會是個網絡的形式，透過同時(即不斷擺盪)的去耦合與鑲嵌，也就是將可能的行動從原有的社會脈絡中鬆脫出來，重新鑲嵌到經濟系統中，一方面既呈現出誘因，同時也呈現出風險，另一方面既傳達出期望，同時也傳達了訊息(Baecker, 1988; 2006c)。

在這種現實的市場(而非假想的模型)中，唯有當生產者對特定價格下的銷路既做出對的假定，也做出錯的假定，經濟系統才運作得起來。換句話說，唯有當某些人覺得無利可圖，同時另一些人卻認為這是機會時，市場才運作得起來(本書頁140-141)。這個看似素樸、不證自明的「常識」，實際上卻是個唯有透過嚴格的理論思考才能獲得及加以證成的洞見。一向宗奉合理性或Simon(1955; 1972; 1982)所謂有限合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經濟學固然見不及此，就是有志一同批判經濟學的預設不符現實，嘗試把社會帶回到經濟之中的新經濟社會學一樣也看不到這一點，因為新經濟社會學一樣不曾認真面對自我指涉的問題，所以無法認識到這背後涉及一個自我指涉的弔詭：「自己的生產決策之所以正確或錯誤，是因為(觀察別人的決策據以做出決策的)其他生產者做了不同的決策」。究竟哪些決策才是「真正正確」的，其實是「無法決定的」。

Beckert(1996: 818)雖然也曾引用過這個段落，但把重點放在事前不可能知道決策正確與否，唯有事後才能檢證上。這樣的觀點自然沒錯，卻錯過了「弔詭」這個重要的問題。有別於傳統認為弔詭會造成動彈不得的邏輯困境，故想方設法加以迴避，系統理論認為弔詭是具有生產性的，必須自我奠基的現代功能系統往往正是以弔詭作為自己運作的基礎(Luhmann, 1988b)。以經濟系統來說，這就表現在看似

「常識」，沒什麼高深理論的「稀少性的弔詭」上。對此，大家一聽就懂、最表面的解讀是：當自己因為想減少自己的稀少性而攫取某個東西時，會相應增加別人在這個東西上的稀少性²⁷。這個陳述更深一層的意涵是，稀少性不但是促成攫取的動機，而且還會透過攫取又製造出自己，因為唯有在稀少性繼續存在的情況下，進行前述的攫取才有其意義²⁸。攫取與稀少性因此形成一種自我指涉，自己創造出自己的可能性條件，並因此形成弔詭：攫取同時增加又減少了稀少性。在此，必須強調的一個關鍵是，這之所以是個弔詭，是因為這發生在同一個系統中²⁹，而不是對某個個人而言。換句話說，稀少性自始便是個社會性的事物，是個社會規約的問題，不能與存有上的有限數量本身相混淆³⁰。

正是在稀少性這個經濟系統「構成性的弔詭」的核心問題上，社會學可以清楚地與經濟學區別開來。經濟學目前近乎共識的界定是，它是「一門行為科學，主要是用來研究如何選擇具有多種用途的有限資源，以生產物品與勞務，供應目前與將來的消費」（張清溪等，1987: 18）。儘管以「因為資源有限，所以有必要就其運用做出決策」為核心的問題意識，經濟學基本上仍只把稀少性理解為存有上的「有

27 細心的讀者在此可能會懷疑，這有何弔詭可言？從個人、從行動論的角度來解讀的確是如此。但就如後面會指出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從整體、從系統的層次來把握攫取的作為，那麼它便會是個弔詭的，同時增加又減少稀少性的運作。

28 因此，Baecker (2006b: 44)特別強調，稀少性既是運作，也是結構。

29 與此類似，對一出現就消失的事件來說，是沒有所謂循環的因果性可言的。所謂的回饋和循環的因果性，預設了較事件更高位階的秩序，例如事件間的關聯、結構或系統 (Tang, 2007)。

30 關於稀少性的問題，不太熟悉系統理論的初入門者，可參見Hahn (1987)較為簡明易懂的說法。

限」，而沒有能力看到稀少性的「社會建構」³¹。可惜的是，新經濟社會學雖然談到了「制度」的社會建構，卻沒注意到稀少性的社會建構，甚至根本就迴避觸及稀少性這個基本問題。也因此，儘管新經濟社會學試圖扭轉「經濟學是門關於如何做選擇的學問，而社會學則是探究人們如何沒有選擇的學問」這樣的刻板印象，卻顯得有些軟弱無力。相對於此，從偶連性、複雜性及相應而來的選擇必要性出發的系統理論，有能力提出一套與經濟學競爭的「選擇」理論。在它看來，什麼會進入到經濟溝通之中，成為經濟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個「選擇」的問題³²。經濟的功能正在於把稀少性引入到經濟系統之中，對它加以溝通，好克服它。而且，就如前述，在克服它的同時，經濟系統又製造出它，所以才能不斷運作下去。有別於經濟學認為稀少性就足以正當化經濟的效率計算的必要性，社會學會把這個正當化的公式也視為是社會偶連計算的結果，並因此可以繼續追問其他的替代可能性，追問稀少性的計算是如何出現的，在個別的案例採取了什麼樣的形式，又具有怎樣的社會後果，所以可以看到一個經濟學所看不到的、更大的遊戲空間(Baecker, 2006b: 9, 13f., 35)。例如，從這個觀點來看，禮物並非與經濟並立的替代選項，而只是有別於市場交換之開

31 在這點上，Baecker (2006b: 13)有寬大得多的不同看法，認為經濟學和社會學一樣，都擺脫了世物有限或人的本質有所缺憾，這樣的宇宙論或人類學假定，轉而只關心會自己生產出稀少性的計算形式。的確，如果把正文中所引國人自撰的教科書的定義，與Robbins (1932[1984]: 15)的「標準定義」相較——經濟學是“the science which studies human behaviour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s and scarce means which have alternative uses”(引自Granovetter, 1990: 90)——，後者顯然就不是從資源有限這樣的存有論假定出發，而是隱涵如下的「建構」觀：是因為應用了特定的目的/手段區分，所以相對於要達成的目的來說，手段才顯得是稀少的。

32 採取STS進路的Muniesa, Millo & Callon (2007)也談到了「經濟化」(economization)的問題。

展稀少性弔詭的不同形式而已。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系統理論對經濟的理解一方面既比傳統的經濟學要來得窄，同時又要來得寬：又一個在傳統認識論看來自相矛盾的講法！一方面，系統理論認為，對稀少性進行攫取這件事本身是不太可能的，亦即它原來的發生機率是很低的。但另一方面，系統理論又認為，對稀少性的攫取有著遠比傳統經濟學認知到的財貨與勞務圖像廣大得多的範圍，一如後來以Gary S. Becker(1976)為代表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所呈現的。儘管如此，社會學與經濟學仍有個關鍵區別：社會學認為經濟的分化出來是個隨時空脈絡而變的變數，不像經濟學視之為恆常不變的常數(Baecker, 2006b: 18)——新經濟社會學的鑲嵌主張也嘗試朝此方向推進，只是誤把經濟的分化出來等同於市場的分化出來。

從稀少性的弔詭切入，系統理論有能力描述經濟是如何運作的。且容我再清楚地說一次，在經濟系統中，稀少性是在同一個運作、同一個攫取的行動中，既被創造出來，又被消除。然而，只有在少數極例外的情形，人們才會把它當作弔詭來觀察——就像讀者在前面讀到相關的句子時，可能也不會覺得是個弔詭一樣。而且，雖然這個弔詭會令觀察卡住，因為人們無法接受上述兩個命題同時成立，但在社會實際的運作中，這個弔詭卻可以獲得展開，並因此變得看不見，而這是藉由把它分配給不同的事物層次、行動者，或時間點達成的(Baecker, 2006b: 22)。

例如，當某人進行攫取時，其他人只是靜靜地旁觀——因為他為此付了錢了(本書頁78, 313)。這除了點出可藉由把稀少性的增加與減少分配給不同的行動者來解除弔詭外，同時也點出了，社會發明了貨幣這個制度性的機制來「解決」弔詭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像經濟學一樣，天真地以為對稀少性的溝通自然就會發生，把它視為隨

機，而是要像通常的社會學智慧所教導的，了解到這背後涉及一個結構化了的關聯，是所謂組織了的複雜性，必須去觀察、探究社會如何「制度化」稀少性溝通的形式。

從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財產與貨幣是迄今開展，並因而「解除」稀少性弔詭最重要的兩個制度。它們之所以能起這樣的作用，是因為它們運用擁有／不擁有，以及支付／不支付這樣的符碼，對經濟的溝通(或運作)進行編碼。魯曼在此援引了在系統理論、複雜理論與混沌理論中極為流行的分岔(bifurcation)的觀念，說明稀少性這個構成性的弔詭，如何得以「在運作中」獲得解除(本書頁159-160, 216以後, 284-285)。這不但是因為這樣的編碼方式以差異取代了統一，阻止了原來的弔詭浮現，而且也是因為這樣的分岔可以不斷地銜接下去，形成歷史與結構，以足夠複雜的開展讓人們遺忘原來的弔詭，以致一般的觀察者只還會看到協調或分配的問題，看到不平等的問題，而不再會對整個體制進行根本的質疑，沒有能力揭露它運作的可能性條件，遑論設法加以鏟除。

然而，財產與貨幣畢竟所有不同。貨幣雖然只是對財產的二度編碼，卻帶來了天翻地覆的劇變——儘管這一開始並不為人所知覺——，令經濟系統的穩定性原則從靜態切換到動態(本書第四章，頁52, 236以後)。在魯曼多元脈絡建構的觀點中，所謂的編碼就是二元編碼，也就是令現實加倍。貨幣這個二度編碼不但創造出支付與不支付兩種現實，同時也讓稀少性加倍了，在原有的財貨稀少性之外，還創造出貨幣的稀少性，但卻能弔詭地藉此減少前者的稀少性。因為，藉著從自然的稀少性到人為的稀少性的轉換，系統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與操弄空間，可以同時將稀少性視為必然的及偶連的，以偶連的稀少性來引導自己。這其中的一個關鍵是，隨著貨幣的發明，人們現在是用兩個較特定的機制取代原先具有多功能的單一機制，也就是在原有

的財貨與勞務協助的轉讓之外，另外創造出貨幣的反向轉讓，以支付能力與無支付能力的雙重循環取代財貨與勞務的單向流動。這個雙重循環成功地開展了稀少性的弔詭，並因此成為經濟系統運作的動力所在，而其最極致、最清楚的表現，便是銀行。銀行事實上是寄生在支付能力與無支付能力、過剩與不足的統一這個弔詭上，也就是立基於經濟系統自我指涉的弔詭。然而，也正是因此，它能夠以資本主義的方式，讓無支付能力弔詭地變成支付能力，展開並解除經濟系統自我指涉的弔詭。所以，一直要到銀行分化出來，經濟系統才算真正徹底地分化出來。

此外，從財產到貨幣的轉換，同時也帶來了不少負面的後果。貨幣使得交換的社會性弱化了，以致原本是以財產來控制交換的情形，會顛倒過來變成交換反過頭來控制了財產，出現馬克思《資本論》中所謂商品循環到貨幣循環的轉變（本書頁228-229, 237, 291），導致「剝削」的問題。從視貨幣為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觀點出發，Luhmann (1975a [1974]; 1976; 1981f[1974])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一般理論，不但看到貨幣象徵的一面、連結的一面，也看到它魔鬼的一面、分離的一面，看到它取代了其他的象徵（本書第七章），同時還有能力跟其他領域的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像是愛、權力、真理或是影響力等比較，從自我/他我與體驗/行動兩組區分出發，清楚地闡釋它們之間的同與異（參見本書頁78注70所附的表）。例如真理雖然具有說服力，但因為是從他我的體驗到自我的體驗這樣的選擇性傳遞，所以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強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它促使人們行動，就像宗教信仰所可能造成的，就可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相對地，權力之所以有別於影響力，在於權力是受到他我的行動而非體驗所促動，背後預設了一個負面的懲罰機制，一個雙方都想避免的局面。

從這樣一套完整的類型學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到前

面已引述過的使用貨幣的好處：當某人進行攫取時，其他人只是靜靜地旁觀——因為他為此付了錢了。事實上，Weber(1980[1922]: 31, 58)對經濟行動(Wirtschaften)的界定——「和平地使用處置的暴力」(friedliche Ausübung von Verfügungsgewalt)——，視市場為彼此互相對抗的鬥爭場域，但卻是個和平的衝突，貨幣是其中鬥爭的工具(Kampfmittel)，就已經觸及這個問題了³³。這彰顯出，對經濟的運作及其秩序的形成來說，重要的是只能對交易加以體驗的第三者(本書頁18，注18, 78, 304-305)，而不在交易的兩造，也就是如何讓未參與交易的人也能平靜地接受這個交易，而不是進行搶奪，以確保自己未來不致匱乏。這帶出的重要理論命題是，對社會學的研究來說，體驗與行動一樣重要(Baecker, 2007a; 2008: 115)³⁴。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新經濟社會學基本上只知道談行動，而沒有注意，也沒有能力處理體驗的問題³⁵。

不只如此，一如其他的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一樣，貨幣還是促成經濟系統分化出來之貨真價實的「去鑲嵌/重新鑲嵌」的機制。當貨

33 受限於英譯的緣故，英語世界只會從「權力」來理解這個問題，像Smelser & Swedberg (1994: 5, 10)便曾觸及這個問題，但也只能把這理解為「權力」，或是更清楚些地譯做「控制及處置的權力」(power of control and disposal)——雖然他們在括號中附了Verfügungsgewalt的原文。相對地，不是透過英文理解韋伯的Callon (1998b: 3, 52, note 6)就清楚地維持了韋伯原來「有形暴力」的意涵。

34 此處無法深入討論魯曼關於行動/體驗這組區分的觀點，意者請參見Luhmann (1981c[1978]; 1984a: Chap. 4)及湯志傑(1992: 91ff.)。

35 這其實是相當可惜的，因為作為新經濟社會學主要支柱的網絡分析對第三者的問題其實是十分敏感的，它之所以能帶來許多超越傳統的洞見，正在於它不再以二元關係來想像社會關係。又相對來說，宗教社會學對體驗的問題就有相當清楚的知覺，很早便知道體驗的重要性，只是一直無法妥善地解決此一難題，往往不是只能在圈內人/圈外人這樣的區分上打轉，便是又落回到「心理」的層面立論，而無法對體驗的社會面向做社會學的探討。

幣將立基於它的溝通從在地的局部脈絡中解脫出來，使這些溝通得以跨越不確定的(indefinite)時空範圍的同時，它也重新將這些溝通結構化、脈絡化，將其鑲嵌到經濟系統之中。而且，就是在這裡，系統理論還是同時觀察到貨幣的兩面性。有別於隨著後現代及文化研究而流行起來的觀念，系統理論認為任何的一般化都必然有個從局部脈絡抽象出來的部分，但一般化並不會因為這樣的抽象就遁入到虛擬性的象徵王國(Symbolreich der Virtualität)中。恰恰相反，一般化會帶著因為重新鑲嵌而獲得的、新的世界脈絡的力量，而再度返回到原來的局部脈絡中。也正是因此，它才會激發批判(Baecker, 2006b: 67f.)。所以，魯曼的系統理論與帕深思的結構功能論絕不是一個版本，絕不如一般想像地保守，而是也有「批判」與「啟蒙」的面向。只是，對魯曼來說，批判之外，更要理解；甚至，理解才是批判的基礎³⁶，就像他把勞動看做寄生者，看做經濟系統既包含進來，又必須排除出去的第三者，對資本/勞動的區分做一歷史的及二階的觀察所顯示的(本書第五章)。

或是因為一向忽視體驗的問題，貨幣在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和討論中常是缺席的，但Zelizer(1989; 1994; 1996)卻是重要的例外。就像Granovetter(1985)那篇里程碑的文章一樣，Zelizer的重要貢獻之一便在於扭轉一些以往錯誤的刻板印象或不當理解，例如錢是種完全同質的東西，必然跟市場有關，而且一旦介入個人關係的領域，必定會把這些關係往工具理性的方向扭曲。Zelizer關於貨幣的文化意義，以及支付與社會聯繫的關係等的討論，不但可以與系統理論對話，相當程度上甚至可以豐富系統理論迄今探索亦屬有限的領域。只是，從系統

36 用魯曼在本書(頁45)中的話來說，「社會學理論既不能過於批判，因為如此一來將無法揭露任何的替代方案，也不能批判得太少，因為如此等於放棄闡明我們與之一起生活的全社會系統的結構基礎。」

理論的觀點反過來看，要說她提出了一套關於貨幣的一般理論，恐怕仍有段距離。系統理論者可以毫不遲疑地同意，Zelizer探討的各式各樣的特殊貨幣有別於一般市場交換中的支付，不能把這逕自等同於一般人理解下的市場交易。但就像前面關於禮物的討論所顯示的，這些特殊貨幣同樣是開展稀少性弔詭的不同形式，仍然有其「經濟」的面向。Zelizer本人一再強調指定用途和另做特殊標記(earmarking)這個技術的重要性，正揭露了這一點，表明這些特殊貨幣固然有所謂另加的文化或社會意義，但同時也還是個經濟的溝通。Zelizer的著作被歸類為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她自己後來也自認是位經濟社會學者，清楚不過地證實了這些不同的通貨(currency)或特殊貨幣一樣是貨幣，一樣有經濟溝通的一面³⁷。

必須再次強調，依系統理論的觀點，現代社會容許對同一個事件、同一個溝通、同一個東西同時有許多不同的建構，因此與前現代社會處於未分化的多功能狀態有著極大的不同，也因此才更有能力解決，或至少是掩蓋看起來彼此矛盾或互相衝突的東西。社會生活中，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未必總是直線。如前面提及的，貨幣有其魔鬼的一面，極易激起批判與抗拒。所以，假道於這些隱諱、曖昧、弔詭的貨幣形式迂迴前進，有時反而更容易達成原來想達成的目的。Zelizer未能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進一步揭露，這些種類繁多、往往被指定用途的社會貨幣其實正好解除，並因此遮掩了它們仍然是經濟溝通的弔詭，殊為可惜³⁸。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及的，Zelizer雖然已敏感

37 比起來，在我們的文化中，雖然多少也有把小費、零用錢、紅包等私人化，將它們與一般市場交易區隔開來的一面，但似不如Zelizer所述那麼敏感而有爭議。或許值得進一步探究，這樣的差異是否跟我們和孔方兄打交道的歷史遠較西方久遠有關？還是跟長期運作中凝結出來的文化習性有關？西方現在的情形仍跟Zelizer描述的20世紀之交一樣嗎？

38 Zelizer (1994: 210)本人對此其實有模糊的知覺，例如她問到難道貨幣在文

地覺察到必須對領域分化的問題再做深入思考，但迄今的理解仍然不夠深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在於仍秉持一種互斥的、實體性的存有論觀念(湯志傑，2009)，未能觀察到多元脈絡的建構，而這卻是系統理論可以回饋給她的重要觀念突破。

事實上，系統理論與身為新經濟社會學主流的網絡分析在根本的理論出發點上，就大有彼此攻錯、借鏡的機會。從系統/環境區分出發的系統理論把焦點放在系統內外界限或邊界的維持上，以致有時對所謂切換(switching)或跨界的問題不夠敏感，正可以與關注切換，視網絡為母群(population)，界限意識相對較模糊的網絡理論互補(Baecker, 2006b; 2006c; 2006d; 2007b; Fuchs, 2001; Reckwitz, 2004; White, 1992: 78f., 126ff.; 1995; White et al., 2007)³⁹。另外，就像Baecker(2008: 117f.)這位在魯曼之後，系統理論從事經濟研究的主要代表自承的，系統理論從經濟系統分化出來的觀點切入的長處是，有能力闡明經濟系統的自主性，精確說明製造及再生產出此一自主性的機制為何。從結合經濟的社會功能(對稀少性進行溝通)及其再生產的運作(支付)這樣的觀點出發，系統理論創造了一套扎實的理論，能成功連結貨幣理論、市場理論與社會理論，形構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相對地，由於系統理論的入門門檻極高，因此難以吸引經驗研究者投入，以致在充分結合理論與經驗研究上仍多有不足，而這毋寧正是系統理論可以從有著豐富經驗研究成果累積的新經濟社會學取經之處。

最後，我還想談一下自我指涉的問題。迄今為止，新經濟社會學

(續)

化與社會面向上的多樣性，終究只是個情感上自我欺騙的形式嗎？但立即就否定這樣的說法。就像後面會討論到的，由於Zelizer跟多數社會學家一樣，沒有正面面對弔詭的問題，所以無法在這一點上突破。

39 不過，就像White也談到界限一樣，Luhmann (1986；本書頁58-59)其實也有談到網絡，而且是以「遞迴網絡」來界定自我生產(auto-poiesis)。

主要都還是在自變項/依變項、經濟的/經濟以外的因素，這種因果思考模式下工作的。這樣的研究取徑有其不可否認的長處，對一般人尤其有其強大的「科學」說服力，但問題是，這與實際上是自我指涉的社會終究隔了一層，難免有隔靴搔癢的問題。就這點來說，Callon (1998a)及MacKenzie, Muniesa & Siu(2007)引入展演論的觀點，探究經濟學、會計、市場行銷、法律等如何「做」、「構成」或說「實踐」了經濟，開始把新經濟社會學的眼光引向自我指涉和反身性的問題，是個重要的突破。不過，以個人有限的接觸來看，雖然作為此一研究取向理論基礎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看來應清楚地意識到自我指涉、反身與遞迴的問題，但目前經濟方面的相關研究，似乎尚未能把這樣的觀點貫徹到整個研究中，堅持從社會最基本的運作(或說構成元素)便具備自我指涉的性質，以及社會過程必定是自我指涉、遞迴的出發。同樣地，雖然在法國學者如Bourdieu等的影響下，Swedberg(2003: 297ff.)也開始注意並討論起反身性的問題，但只探討了自我指涉中較狹、較特定的一部分，基本上只處理了知識社會學的問題，追問如網絡分析是否是新自由主義的共謀，而不及知識論及存有論的反省。

相對來說，魯曼在這個問題上的探討就廣得多，也深得多。例如，魯曼在本書(頁86以後，166以後)中談到了所謂的反省理論(Reflexions-theorie)，也就是經濟系統對自己進行反省的理論，係它自己發展出來的自我觀察與描述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與Callon(1998a)等人，把市場鑲嵌於經濟學之中的取徑比較。同樣從自我觀察與描述的觀念出發，Luhmann(1982d[1973]; 1987b; 1987c; 1997a: Chap. 5; 2001 [1986])還談到過社會的自我論題化(self-thematization)，描述並解釋了「(市民)社會」語意的出現，市民社會及商業社會的語意如何在描述經濟日益增長的自主性的同時，促成了

經濟的分化出來和政治與經濟的分化，以及為何到現代的轉型會被呈現、理解為從政治的優位性轉換到經濟的優位性，事實上真正形成的卻是到功能分化的社會結構轉型，功能分化多元脈絡建構的講法，才是足以因應現代社會複雜性的自我描述(湯志傑，2004a: 145ff.)。

此外，Luhmann(1970d[1966])還研究了將自己應用到自己身上的反身性機制，指出它們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與條件。反身性的機制之所以在現代功能分化社會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原因之一即在於它們純是過程取向，因此有助於從小系統中建立起大系統，有助於功能系統的分化及穩定。但反過來，功能分化與專殊化則是它們得以形成的前提。

事實上，Luhmann(1984a: 600ff.)清楚區分了三個自我指涉的層次：基礎的自我指涉(元素)、反身性(過程、反身性的機制)，以及反省(系統)。所謂基礎的自我指涉是指，元素必定會以遞迴的方式指到同一個系統的元素。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這不只是往後，以已發生的、過去的元素為參照而已，而是也可以往前，以預期會發生的、未來的元素為取向的依據。這可以說是系統運作的動力之所在，一定意義上最為根本，卻也是最常被忽略的自我指涉。相應於這個特質，自我指涉的系統必定是個運作上封閉的、自我生產的系統，而且它的構成元素必定是徹底時間化了的元素，也就是一出現就又消失了的事件——不論這是溝通、意識、神經脈衝還是生化反應。

所以，魯曼主張並強調，經濟系統並非由實體——不論這是人、交易、貨幣還是其他任何什麼東西——組成的，而是只由作為事件的支付組成(本書頁36)。同時，我們不能把經濟系統只當作個客體(object)來觀察⁴⁰，而必須視之為會自己觀察自己的系統(本書頁

40 事實上，所謂的客體在系統理論看來，不過是遞迴的認知運作中凝結出來

111)。有別於輸入便決定了產出為何的情形，經濟這個自我指涉、會自我觀察的系統——一如所有的社會系統——，是所謂非恆定的機器、歷史的機器，它的產出不只由輸入決定，系統當下的狀態，尤其是系統當下的觀察同樣扮演重要角色。相應地，要駕馭這樣的系統只能透過自我駕馭⁴¹，而它所能做的，不過也就是把自己對於處境的回應又再次建入到同一個處境之中(本書頁29、第十章)。又在藉觀察指引運作時，認同與歷史的建構是重要的指引工具。不過，自我觀察與描述必然是個簡化，其中必定蘊涵著風險，這也就意味著未來有改變的可能，只是始終是個路徑依賴的改變——不只是認同，就是歷史，也會隨著認同的改變而改寫，一如新經濟社會學本身的歷史書寫所顯示的(湯志傑，2009)。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魯曼採取與經濟學相同的立場，認為價格(本書第一章)是經濟系統的一個訊息機制，人們可以藉此觀察其他人如何觀察市場，以及根據價格的變動來辨識發展的趨勢。此外，由此出發，魯曼還能進一步說明經濟系統的反身性機制與循環的結構。例如，現代貨幣經濟是以貨幣的價格，也就是處於更高反身性層次的不穩定，來控制商品價格的不穩定。藉著支付、價格、貨幣、作為二階觀察機制的市場等環環相扣的概念，魯曼詳細地描述了自我指涉的經濟系統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在此必須特別澄清的是，遞迴(recursive)不只是不斷往前、往後參照而已，更重要的是，遞迴蘊涵了自己(系統或元素)同時既是運作(續)——

的固有价值罷了(von Foerster, 1984[1976])。

41 值得補充的是，相應於把心理系統也看成一個自我生產的系統，因此魯曼主張，所謂的社會化只能是自我社會化，也就是只能由習慣上所謂被教育、被社會化的個體自行為之，自己來駕馭其學習。這或不算特別新的洞見，但如果人們認真對待這個觀念的話，毋寧會得出跟傳統面對教育問題時極不一樣的看法。

的施為者(operator)，又是運作所加諸的被施為者(operand)這樣的自我指涉，就像 $a_n = 1/2 \times a_{n-1} + 1$ 這個數學式所表明的。這會帶來知識論上必須嚴肅面對的後果，也就是單向、線性的因果觀念(如自變項/依變項、經濟/非經濟因素這樣的變項式因果思式)所無法掌握的「循環的因果性」的問題⁴²：例如持線性因果觀的新經濟社會學將很難理解，為何它本身發展的歷史起點竟是由後來的歷史書寫所決定，並且一變再變(湯志傑，2009)。從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我們不只要認識到所謂的因果其實預設了一定的前提，不過是某個觀察者運用了特定的因果區分來觀察，並且因為認為此一區分能在時間中維持而認定其中有因果，更要認知到社會的現實其實是自我指涉的、充滿循環的因果性，從而就是對自己來說也是不可預測的，而不是個不需考慮其他脈絡的、決定論式的線性現實(Heylighen, 1989; Luhmann, 1982e; 1995c)⁴³。功能論的長處之一正在於從問題/問題解決的區分出發，把一般視為不變的因果關係變成偶連的，藉著揭露彼此可互相替代的功能對等項，指出多重因果的可能(Luhmann, 1970a[1962]; 1970c [1964]; 湯志傑，1992: 56ff.)。

關於這個嚴肅的知識論的，同時也是存有論的問題——研究對象自己會觀察自己、會不斷地改變！——新經濟社會學迄今未曾賦予足夠的注意。因此，在這點上，魯曼以自我指涉為出發點，嚴格且一貫地將這樣的思路貫徹到所有的思考與主張中的系統理論，大有可供新經濟社會學參考之處。根據這樣的想法，Luhmann(1984a: 19, Chap.

42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就瞬息即逝的事件這個層次來說，是無所謂循環的因果性可言的。循環的因果性預設了系統，或至少是結構的形成(Luhmann, 1984: 608)。

43 必須澄清的是，這不表示系統理論認為一定不要談、不能談因果，而是指出一個知識論上必要的反省與警覺：不要太過自以為是地談因果，渾然忘了自己觀察的盲點，以致在現實中造成危害。

12)強調，所謂的「普遍理論」，其判準不在放諸四海而皆準，可以應用到一切(包括未來)的東西上，而在於能滿足把自己及其對立面也包含到自身之中這樣的普遍論宣稱，滿足把同一套理論也應用到自己身上這樣的要求。就社會學來說，尤其是要看到自己也是自己研究的對象，也就是社會的一部分。

最後，這種嚴肅面對自我指涉的取徑甚至會帶來一定的倫理學意涵——雖然魯曼本人盡量避免觸及這樣的問題，但我認為不妨參考其他人的觀點加以補充。根據系統理論的看法，部分其實比整體有反省能力，唯有當身為對象一部分的觀察者對整體做出區分後——至少是把自己與整體區分開來，整體才變得是可觀察的，就像社會之所以是可觀察、可描述的，絕不是整個社會對自己做觀察、描述，而必然只是它的一分子，如社會學，在對它做觀察與描述而已。這同時也就意涵了，各個部分對於整體的建構很可能是不同的建構，the same is different！由於這些都是社會的自我觀察，所以會有找不到客觀判準可供作為憑判依據的問題。習於既有存有論觀點及線性因果思考的社會學家，或許會對此感到驚慌失措，乃至擔憂陷入無政府的失序狀態。事實上，就像前面多少也已點出的，系統在偶連的運作中還是會結晶出相對穩定的固有值作為指引的取向，不必太過憂慮因為自我指涉就會陷入混沌、動亂。事實上，唯有差異才能製造出訊息，唯有不同的觀點，才能帶來觀察的深度(Bateson, 2003[1979]: Chap. 3)。所以，秉持對自我指涉的認知而來的消極倫理命題是，我們在知識論上必須不斷地自我提醒，所有的自我觀察都是種簡化，因此不宜過度執著自己的觀察在科學上的「客觀性」，認定係唯一的「真相」，以免無意間因為太過專斷反而造成災難或迫害，因為自我觀察與描述是會反過頭來對系統實際的運作產生作用的。不只如此，就積極一面來說，更必須像對納粹迫害有一手觀察、對自認「客觀」的科學可能造

成的危害深有體會的von Foerster(von Foerster & Pörksen, 2004: 36, 轉引自Herting & Stein, 2007: 4)所說的,「總是以能增長自由度的方式來行動」,盡量揭露其他可供選擇的可能性——Luhmann(1970e [1967])所謂的「社會學的啟蒙」。從倫理的標準來看,唯有這樣的自我描述才稱得上是夠格的、好的自我描述。這無疑是值得追求,且仍有待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系統理論一般概念與進路的介紹

為了幫助讀者能正確掌握本書的論點,有必要在此簡略介紹一下書中未及詳論的系統理論的一些基本立場與觀點⁴⁴。首先要澄清的是,雖然以系統理論為名,但魯曼的理論實際上是由系統理論、演化理論,及溝通理論三個支柱共同構成(Luhmann, 1982b: Chap. 11; 湯志傑, 1998a),而且魯曼雖以系統理論知名,但首先是位社會學家,尤其是致力於(以整個社會為探究對象的)社會理論(Gesellschaftstheorie)的社會學家,以追求所謂反省過了的自我學(reflektierte Autologie)為目的(Luhmann, 1971b[1969]; 1997a: 1128ff.)。相信前面關於貨幣和稀少性的討論,已清楚彰顯出溝通理論,尤其是溝通媒介的理論在魯曼整個理論中的重要性⁴⁵。同樣地,像系統分化形式及所

44 關於魯曼理論的一般簡介及評價,就可及的英文文獻來說,可參考Baecker (1999a)及Bechmann & Stehr (2002)在魯曼過世之後的悼念之作。King & Schütz (2004)從理解魯曼的障礙入手,也值得一看。另以書來說,Rasch (2000)及Moeller (2006)也都有些參考的價值。

45 要補充的是,在Luhmann(1997a: 202ff.)那裡,溝通媒介還分為傳播媒介及成功媒介。前者指能擴大溝通接收者範圍的媒介,如語言、文字、印刷術、電子媒體等。至於成功媒介就是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如貨幣、權力、影響力等,其作用在提高溝通被接受的機率,因此有助於促功能系統分化出來。

謂鑲嵌形式改變的問題，不只要訴諸系統理論，同樣也需要藉助演化理論的觀點加以闡明，才能說清楚為何原本發生機率很低的事物竟會變成常態而穩定下來。

其次，對Luhmann(1982b: 238ff.)來說，必須同時兼顧(對整體的)功能/(對其他次系統的)成效/(對自己的)反省這三個系統指涉。而且，有別於習見的誤解，魯曼不認為光靠功能便足以令功能系統分化出來(本書頁156)，分化的模式更不是像帕深思的AGIL模式，固定只能有這樣的四分。雖然魯曼認為一般而言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有助於功能系統分化出來，但他毋寧是在觀察經驗現實的基礎上立論，把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形成與作用扣連到雙重偶連性這個根本的秩序問題，建構出一套嚴謹的理論(Stäheli, 2000)。另外就像前面已觸及的，對魯曼來說，功能無非是問題及問題解決這樣的一組關係，因此作為基本參照的問題(Bezugsproblem)就很重要(本書頁75)。例如，按經濟學的標準看法，經濟的功能便在於預先解決未來需要滿足的問題，以系統理論改寫過的更精確的版本則是，如何將為了確保未來而預做的準備與現在的分配銜接起來(本書頁72)，或是如何分配未來的確定性(本書頁80)。

第三，就社會系統來說，Luhmann(1975b; 1982b: Chap. 4)區分了互動/組織/社會三個層次。互動以在場與否為界，組織則是以(可自由選擇的)成員身為界限，社會的界限則在於是否是溝通。就像前面已觸及的，必須注意這些層次間的分化在不同的社會形態間不盡相同。例如在無文字的部落社會或分支分化中，互動與社會基本上還難以清楚分化開來。至於組織，一定意義上是現代的發明，同時也在現代社會中扮有特別重要的角色，因為功能系統一來不具行動能力，二來實際上做不到對所有的人進行涵括的要求，常必須藉助組織來解決、處理相關的問題。也因此，組織與決策也是魯曼長期關注的議題

(如本書第八、九章)。

必須指出的是，跟一般既視社會為最廣的概念，同時又視它為與政治、經濟等並列的一個領域一樣，在魯曼那裡，社會也是個雙義的概念。不過，同樣是雙義，魯曼卻是以極為不同的方式來開展。就像系統理論常說的，區分終不免有弔詭，問題在於看它把弔詭藏到那裡或是如何開展，而這的確是有差別的。有別於習見的以人或地域來界定整體社會的概念，對魯曼來說，溝通/非溝通才是界定社會的界限所在，因此相對於社會的不是一般理解的其他社會，而是心理系統或生理系統等其他不同類型的系統，如此才能真正貫徹以社會作為廣含的整體的想法，而現代社會相應地只能是個世界社會，只有一個世界社會(Luhmann, 1970g[1968]; 1982a; 1997b)。同時，有別於政治/經濟/社會或國家/社會這樣的領域劃分觀念，魯曼是以社會/組織/互動的層次區分來開展，並且是把這樣的層次關係視為一層包一層的涵括的階序。採取這樣的進路，魯曼不但可以比較好地解開弔詭，而且還可以看到多重建構的可能，此所以他會一反社會學的傳統智慧而主張說「部分之和大於整體」(Luhmann, 1982b: 238)。

第四，多重建構的複數現實的主張，清楚宣告了Luhmann(1990c: 280)是採取所謂「後存有論」的進路，以差異而非同一(identity)為取向(Clam, 2000; 2002)。前面談到的功能/成效/反省三個不同的系統指涉其實便已暗示了，同一件事對不同的系統來說，意義是不一樣的，是不一樣的現實。所以，魯曼不是遵循傳統實體切割的模式，從整體/部分的區分出發，認為系統 + 環境 = 世界，而是主張系統/環境 = 世界⁴⁶。對正確理解Luhmann(1997a: 60, 76f.;

46 如果讀者理解上有困難，不妨先用前面那個加法的等式來想像。要提醒注意的是，環境同時還有內環境(Innenumwelt, innere Umwelt)與外環境(Außenumwelt, äußere Umwelt)之別。以市場作為經濟系統的內環境來說，

Bechmann & Stehr, 2002: 69f.)的理論來說，最為關鍵之處便在下述的觀念轉換：不再把系統理解為客體，而是理解為區分(系統/環境的區分)(亦見本書頁6)，而且不是把這理解為既存事物間的區別，而是要回溯到究竟是哪個觀察者做出此一區分，因為若非先做出某個區分，將無法指稱、無法觀察。相應地，系統/環境之間的界限不是條空間的界限，而必須從運作的角度來理解，把它看做是系統運作的具體化。換句話說，系統的每個運作都一再重複了系統/環境的區分，而這正是Luhmann(1988; 1994: 478, 480; 2006[1996]: Chap. 1, 11 & 12)運作建構論的立場：唯有透過運作，現實才會形成，而且現實也只存在於運作之中⁴⁷。

第五，正面且嚴肅地對待時間的問題，是魯曼所以會及所以能走向「後存有論」轉向的一個關鍵。追隨Whitehead(1978[1929])「過程就是實在，實在就是過程」的觀念，Luhmann(1984a)堅持以沒有綿延、一瞬即逝的事件為動態的自我指涉系統最基本的元素(本書頁21-22)。從這樣一種徹底時間化的觀念出發，配合上運作這個超越元素/關係的靜態區分，「以選擇性的關係化作為基本的元素」(Luhmann, 1997a, 139, note 181)的概念，魯曼能夠真正貫徹一種關係(續)

這既是相對經濟系統作為整個系統來說，也是相對於經濟系統內的次系統來說。至於經濟系統的innergesellschaftliche Umwelt，指經濟系統在社會內部的環境、全社會之內的環境或說社會所給予的環境，這等於經濟系統的(全)社會環境(gesellschaftliche Umwelt des Wirtschaftssystems)，即扣掉經濟系統的社會，包括政治、宗教等系統以及——一切不可忽略的——其他無法納入功能系統的東西。至於像心理與自然，則都只是社會的外環境，自然也是經濟系統的外環境。

47 必須特別強調與澄清的是，Luhmann(2006[1996]: 35, note 7)的運作建構論有別於所謂的「徹底建構論」(例如Schmidt, 1987)，因為他認為「徹底建構論」所謂的「徹底」兩字，是邏輯上不可能的位置。另外，Luhmann(1990e: 37)並未否認現實或實在，而只是將之「去存有化」(de-ontologisiert)。

論的取向，不但足以與行動者—網絡理論或以Bourdieu為代表的實做或實踐的轉向(the practice turn, 另見Schatzki, Knorr Cetina & von Savigny, 2001)相較，甚至還可超乎其上。

第六，魯曼的系統理論之所以能超越傳統和同儕，關鍵之一正在於他一貫地以時間、偶連性及弔詭為理論的出發點。傳統上，社會學多援引自然科學通則性的知識模型，認為一次性的事件無法帶來知識所以不值得研究，唯有反覆發生或規律的結構現象，才是必須探究的對象。雖然隨著時代以及知識氣氛的轉變，本是追求「本質」的現代科學(社會科學尤然)已日益跳脫本質主義的陷阱，向偶連性轉向(Fuchs, 2001)⁴⁸，而且時間也受到愈來愈多的注意，但是弔詭，尤其是自我指涉的弔詭，在社會學中卻始終還是被忽視。

其實古典社會理論對此並非毫無知覺，像前引韋伯「和平的暴力」的說法，便是一個顯例。只是，受限於傳統的認識論，古典大師還是把弔詭和套套邏輯看做是不可能及無意義的陳述，因此往往只能把弔詭表述成像Simmel一再觸及的曖昧、矛盾或模糊(ambivalence)，而無法接受以弔詭作為科學研究、獲得知識的起點(Baecker, 2006b: 24)⁴⁹。有別於此，正像本書藉分析稀少性的弔詭所揭示的，魯曼認為弔詭對系統來說是構成性的，是系統運作所需。要能正確掌握到現實、掌握到自我指涉系統的運作，不但要超越傳統避弔詭與自我指涉唯恐不及、從主體/客體區分出發的知識論框架，同樣也要跳出傳統存有論的框架。以稀少性這個魯曼所謂的偶連性公式為例，便既顯得是必然的(對藉此公式來觀察及結構化自己的系統而

48 關於偶連性作為現代的語意以及與現代性的關係，進一步可參見 Makropoulos (1997; 2004)。

49 像Callon (1998b: 39)一樣還是只能援引Simmel，談及一種不可化約的模糊或曖昧(irreducible ambivalence)而已。

言)，又顯得是偶連的(對看穿此類公式的功能，因而能追問其功能對等項的觀察者來說)(本書頁230)。雖然是同一個對象，卻可具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質，是傳統知識論及存有論所無法掌握，至少是無法接受的，而這卻正是系統理論嚴謹的理論思辨所能帶給我們的洞見。

第七，魯曼之所以不會像傳統哲學一樣被自我指涉和弔詭的問題卡住，在於魯曼不是以哲學的思辨方式，不是訴諸先驗，而是以Quine(1969)所謂「自然化的」認識論，以社會學的方式，藉著引入時間以及觀察弔詭在現實運作中的開展來解決弔詭的問題，也就是把弔詭的哲學問題當作社會系統中運作的問題來觀察(González-Díaz, 2004; Thyssen, 2004)。所以，如前面已引述的，Luhmann(1995b: 42)會說，「弔詭並不會就阻止了系統的運作，相反地，弔詭正是系統運作的可能性條件，因為運作的自我生產需要持續具有不同運作的現實性，需要實現不同的可能性。」

第八，相應於從事件、從偶連性出發，魯曼對於結構也有前人所未見的獨特洞見，一定程度上揚棄了結構/施為這個Giddens(1979)所謂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概略來說，魯曼是以結構/事件、運作/觀察、自我指涉/異己指涉、社會系統/心理系統……等多組區分來取代及開展結構/施為的區分(Tang, 2007; 湯志傑, 2007: 85ff.)，因而能一方面堅持從偶連性與事件出發，另一方面不但一樣能談結構，而且還能邏輯一貫且具說服力地談結構。有別於視結構為規則、規律或反覆出現的現象，Luhmann(1984a: Chap. 8, 1987d[1980]: Chap. 2)主張結構始終是指期望，而且是指作為社會的意義形式，而不是內在心理過程的期望，是在事件的遞迴運作中形成的、相對穩定，卻又可以改變且不斷改變的意義形式。相應於事件一出現就又消失，對系統的運作、對事件的銜接來說是必要的結構，也總是只在當下存在，唯有當結構被使用了，當當下的運作或是證成或是修正了結構，結構才存

在。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現實性／潛在性這個區分——在Luhmann (1984a: Chap. 2)看來，這是意義所使用的根本區分——出發，認識到結構並非始終存在，而是只有在運作之中，在運作的再生產中存在；但同時結構又始終是個「潛在的」存在，是邏輯上而非時間上或存有上的「先在」，因此能夠以外於事件序列的方式，「先在地」對將發生的事件和運作產生影響。

自Parsons從雙重偶連性的問題切入，提出互補期望的概念以來，社會學家對期望的概念並不陌生，一定程度上甚至早認識到期望的重要性——在象徵互動論的傳統中尤其如此。就是Granovetter (1990: 99)也清楚地了解到，工人及監督者如何互動，很大程度上受他們互動的歷史，及其產生的「相互期望」所決定。另外像Nee & Ingram (1998: 25)也援引Homans交換論的傳統，認為交換會建立起相互的期望，一種最初並未明白說出的相互理解，而社會秩序便是不斷重複的社會互動的副產品。儘管如此，迄今似乎仍只有魯曼視期望為結構概念的核心與關鍵，將之一般化與理論化⁵⁰。而唯有踏出這一步，才有解決行為與(期望)結構落差的問題，真正貫徹一種非本質主義的立場。

就像前面在討論運作的概念時已指出的，魯曼是從「選擇性的關係化」這個徹底關係論的立場出發，不論是所謂的事件、社會關係或結構，都不能將之物化，視為客觀、恆定、外在或先在。結構母寧是關係之間的關係，就它作為模式來說固然相對穩定，因此會給人規律和反覆發生的印象，但一樣是事件遞迴的再生產的產物，是系統運作不斷往前和往後參照，且作用於自己身上的產物，不但可以改變，而

50 相較來說，經過「認知轉向」的制度論雖然對期望有可與魯曼比擬的了解 (Hall & Taylor, 1996)，但由於始終還是把結構視為更大、更遠、更外在的東西，不曾把制度理解為結構，所以仍然無法掌握到結構與期望的關聯。

且可以突然劇烈改變。

此外，事件(及施為)與結構分屬不同的實在層次，不可混為一談，或把結構視為事件或行動的累積。事結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是個相互循環建構的關係，就像個交互纏繞的莫比斯帶(the Möbius Band)一樣。結構唯有透過事件才得以建立與改變，但反過來，結構卻也駕馭了事件的銜接。

第九，如本文已一再強調的，社會現實是個自我指涉的過程。要解決因著自我指涉而來的難題，Luhmann (1978b: 417; 1980; 1990c: 76ff., 92f., 278ff., 514; 1993: 51, 506 ; 本書頁70)不再是訴諸主體/客體這樣的區分，而是以運作/觀察、自我指涉/異己指涉等區分來取代。雖然就觀察也是個運作來說，運作/觀察這樣的區分仍不免陷入弔詭，但因為以自我指涉來解除因著自我指涉而來的套套邏輯必然會失敗，所以藉著繞道這樣的區分來開展弔詭，有其必要。藉著引入時間，系統理論能比傳統的認識論更好地解釋運作與觀察，以及認知與現實之間的循環關係，不只能夠把既無法只歸於系統，也無法歸於環境之系統的統一，當作在無法加以觀察的運作之執行中產生的結果，而且也能把客觀性與現實清楚地區別開來，不會像傳統認識論一樣誤以為觀察的合致(所謂的客觀性)便保障了對象的現實性。

第十，跟前面自我指涉系統配套的想法是自我生產(*autopoiesis*)的概念。依此，所有在系統中能夠作為一個單位起作用的東西，統統都是系統自身的成就(本書頁54)。Luhmann(1984a: Chap. 3, 4)堅持以溝通為社會的基本元素，不但自始就從系統的層次，從社會系統這個新的系統層次的茁生來掌握社會性，同時還徹底地貫徹建構論的想法，認為唯有當一般所謂的訊息接收者以訊息/告知這組差異來進行理解，也就是進行觀察與建構時，溝通才告出現。他分析指出，在雙重偶連性問題的催化下，任何的偶然都很容易被轉化為建立結構的可

能性，從而促成了原本發生機率很低的社會系統與秩序形成。比起以個人、(朝向他人的)行動或社會關係為社會的最終元素，系統理論不但更好地關照到社會性的問題，也能更好地解釋社會秩序的形成(Tang, 2007; 湯志傑, 1992)。

必須澄清的是，魯曼所謂的茁生有別於傳統「總體大於部分之和」的茁生觀念，尤其有別於經濟學從個體主義出發的茁生觀念，認為茁生的社會性質或集體現象必須回歸到個體來解釋(Sawyer, 2002)。就如自我生產概念所明示的，Luhmann(1984a: 43; 1997a: 134f., 413)採取的是「『由上往下』的構成」的看法，而不是「『由下往上』的茁生」。為了避免誤解，他一度說茁生比較像有助於解釋的比喻，而不是個本身能提出一套充分解釋的嚴謹概念。就茁生這個比喻來說，魯曼取的是較高層次的系統以較低層次的系統(如社會系統以心理系統)為基礎(因此承認物質及因果的連續性)⁵¹，但不同層次的系統間是斷裂、不連續，也就是運作上完全不相及，各自運用全然不同類型的元素這樣的意象。就如前面已提及的，在魯曼看來，人或心理系統是社會的環境，必須以相互滲透的概念來掌握兩者間的關係。

十一，魯曼的一些基本看法深受George Spencer Brown(1969)《形式的法則》一書所影響⁵²。據此，任何的指稱，以及相應地任何

51 Luhmann (2002: 267)甚至一度表示，自我生產的概念「強迫」人們在強調運作封閉的同時，必須以因果上的開放來做「補償」，而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關係尤其如此。就這點來說，Elder-Vass (2007)並未能正確掌握到Luhmann的「茁生」觀點，乃至做出以Roy Bhaskar, 及Margaret Archer為代表的批判實在論較系統理論為佳的論斷。在我看來，後者仍深陷存有論的泥淖，而且並未真正正視——違論解決——自我指涉的問題。

52 對此，中文方面可參考Luhmann (2005[1992]: 109ff.)的精簡討論，英文方面可參考Luhmann (1992c; 1994b; 1995b)和從Luhmann (1991b)節譯，但後面甚為關鍵的部分並未被譯出的Luhmann (1990)等相關論著，以及Baecker

觀察，都以先做出一個區分為基礎，而這整個具有兩邊的區分被看做一個形式。其中未被指稱的一邊，稱作「未標記的空間」⁵³。而任何的區分，任何的觀察，都會有盲點，因為區分或觀察這個運作本身，以及做出這個區分的觀察者本身，必然無法在這同一個運作中被觀察到。此外，如具有兩邊的形式概念已暗示的，任何的指稱或觀察必然以「未標記」的一邊為支撐，是建立在所謂「未寫出的跨越」這個脈絡的基礎上。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系統理論一樣可以看到Callon (1998b)提出的framing/overflowing這一組關係⁵⁴，以及現代經濟看似萬物皆可購買，其實係建立在某些東西不可購買的基礎上(本書頁288-289)。正由於任何的區分和觀察必然會有盲點，所以Luhmann(1997a: 1121)強調要以運作的潛在性(operative latency)取代結構的潛在性，以區分或差異的推移揭露盲點，令必然的潛在性變成是偶連的，達成社會學啟蒙的目的。

此外，區分會「再進入」到被區分開的其中一邊之中，這會造成同一個東西但又有所不同的弔詭，像經濟系統就既是系統又是內環境。要解開這一個無法決定的弔詭，必須藉著引入時間，看到它在兩者間擺盪，以致可以在特定的時點或相對特定的系統指涉或觀察者來說，確認它是處於什麼狀況。所謂的系統分化基本上便是這樣一種再進入，因此必須從多元脈絡、多值邏輯及多重的世界建構的角度來掌握。

(續)

(1999b), Kauffman (1987), Schiltz (2007), Spencer Brown (1993), Varela (1975)等的進一步討論。

53 魯曼有時會把這個術語與「未標記的狀態」混用，後來才因應評論的指正而做出進一步區分，以「未標記的狀態」指尚未做出任何區分之前的世界，「未標記的空間」則是做出區分後，未被指稱的一邊(Luhmann, 2000a[1995]: 326f., note 63)。

54 對此的討論見湯志傑(2009)。

三、本書在魯曼著作中的位置、學界的反應及值得注意的新發展

Luhmann (1958)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著〈行政科學中的功能概念〉，發表於他仍擔任行政官僚的期間⁵⁵。該篇論文雖然跟他的現職有密切的關聯，是篇關於行政學方面的文章，卻已清楚表明他濃厚的學術與理論興趣。可以說，魯曼一開始便是以檢討功能的概念起家。從Luhmann(1960)的第二篇論文〈行政管理能夠以經濟的方式行動嗎？〉來看，可以推測說他很早便對經濟的議題感興趣，只是這篇論文的主要取向毋寧還是組織與行政管理方面。1964年發表的教授資格論文(Luhmann, 1964)，除了反映他早年的經歷，也再次證明組織社會學可謂他最早的看法本領⁵⁶。如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所呈現的，組織社會學在後來的發展中往往與經濟社會學合流(湯志傑, 2009)，而Luhmann(1966)很早就注意到組織社會學對經濟社會學及實際企業經營管理可能有的貢獻。

表面上看，魯曼早期的研究多著重在組織與法律方面，反映其法學訓練及行政官僚的出身。但就如他的第一篇文章已顯示的，在這背後實已隱藏著深刻的理論關懷。早在取得博士頭銜，獲得學界的入場券，正式擔任大學教授，開展其學界生涯前，Luhmann (1970a [1962]; 1970b [1962])便已經發表過〈功能與因果〉⁵⁷、〈真理與意

55 關於魯曼的生平，見本書後附的年表或湯志傑(1998a)的簡介。

56 Luhmann (2000d)過世後才出版的《組織與決策》，是他關於組織研究的代表作。就魯曼區分的社會、組織、互動三個系統層次來說，魯曼唯獨欠缺研究互動系統的專書。魯曼的關門弟子Kieserling (1999)專攻互動的研究，多少可看做在彌補這個缺憾。

57 魯曼便因這篇文章與Helmut Schelsky結緣，後來便從原先任職的Speyer行

識形態〉兩篇文章，接著還發表了〈功能方法與系統理論〉、〈目的、支配、系統〉(Luhmann, 1970c[1964]; 1971a[1964])等文章，清楚顯現出魯曼很早便有投入社會學理論建構的志向，而且一開始便是採取功能—系統論，而不是結構—功能論的取向，強調功能作為一種比較的觀點和視野。

1967年，Luhmann (1970e[1967]; 1970f[1967])憑著〈社會學的啟蒙〉的就職演說，以及〈社會學作為社會系統的理論〉的系統理論宣言開始嶄露頭角，引發注意。接下來，Luhmann(1971b[1969]; 英譯1987f)於第十六屆德國社會學會大會發表的〈作為總體社會分析形式的現代系統理論〉一文，更引起批判理論陣營的注意，促使哈伯瑪斯出面邀請魯曼至法蘭克福授課、演講，與之辯論。雖然作為雙方辯論成果的《社會理論還是社會工程學？》系列書籍(Habermas & Luhmann, 1971; Maciejewski, 1973; 1974)，在標題上一面倒地偏向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卻也令魯曼聲譽鵲起，從此成為德國學術界必然關注的對象⁵⁸。

1970年，魯曼正式推出《社會學的啟蒙》論文集。這個最初的本並無第一冊的字樣，可見並非長期規劃的產品。這本魯曼早期的代

(續)

政高校(1962-1965)轉到Münster，追隨Schelsky。在Schelsky的指導下，魯曼在僅僅相隔五個月的情況下，分別交出博士論及教授資格論文(1966年)。據他所述，大約要到這個時候，他才正式下定決心踏入社會學界。他一開始任職於Münster大學Schelsky主持下的Sozialforschungsstelle (1965-1968)，後來更追隨Schelsky，轉而任職於自1965年由Schelsky開始籌建，1969年正式創設的Bielefeld大學社會學院任職，一直到1993年退休為止。

- 58 Luhmann (1987e: 125f.)在訪談中便表示，就其理論的繼受來說，必須區分兩個階段。早期，也就是1960年代末，主要是覺得批判理論的觀念基礎相對過於簡單的左派知識分子被吸引。這反映在像Gunther Teubner及Helmut Willke這些主要是私淑，而非在其直接指導下取得學位的學者身上。他們早期便曾嘗試結合系統理論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Teubner後來更致力於結合系統理論與解構的觀點。

表作雖然也收錄了一篇關於經濟的文章〈作為社會系統的經濟〉(Luhmann, 1970h; 英譯1982b: Chap. 9)，但相較書中其他論文多係已發表過的文章，這篇新撰的文章看起來好像是為了因應論文集的出版，才試圖對經濟這個現代社會生活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領域，也補上些討論，而比較不像是長期審慎思考的結晶。事實上卻非如此，憑著嚴謹的理論思辨訓練、敏銳的觀察力，以及大量的閱讀，魯曼在這篇文章中已提出不少成熟且深入的觀點，後來的不少觀點均可追溯於此，可說已成功踏出關於經濟方面研究的第一步。

例如，Luhmann (1982b: 198)開宗明義便聲明，分化並非指經濟從社會之中切割出來，彼此不再互賴，而是重新結構化彼此的依賴關係。而且，經濟並非遵循「需要」的內在邏輯，而是遵循令經濟專殊於「延遲決策」(deferring decisions)的功能這個內在邏輯的需要。相應地，雖然乍看之下，行動的經濟取向表現得跟利潤得失的「計算」有關，並因此顯得是可加以合理化的。然而，事實上，行動之所以是取向於經濟的，是因為藉由確保需要未來會獲得滿足，行動在現在獲得了一個處置的遊戲空間(Dispositionsspielraum)，並得以在其中運作(ibid: 196, 201)⁵⁹。同時，魯曼強調「稀少性」並非意指罕有或缺乏某項東西，並非自然的某個性質或需要與滿足需要的可能性之間既定的自然關係，而是個抽象的比較觀點(ibid: 195)。此外，魯曼在此也談到了市場是在角色層次上達成的分化出來，是在協助、禮物及節慶之外，利用剩餘及滿足需要的新形式，清楚地意識到市場的演進，而沒有從現代往回投射，犯下Polanyi所謂「唯經濟論的謬誤」(ibid: 198)。他還進一步申論，市場「促成」了無私的、「非人際的」(impersonal)關係，但這意指將參與者的其他角色的相關性予以中立

59 此處的英譯不夠精確，係按德文版(Luhmann, 1970h: 211)做出修正。

化，去除「道德上的束縛」。要注意的是，魯曼講的是「促成」，不能把這誤解為「等同」，以致犯下結構功能論及現代化理論影響下的錯誤，認為現代市場交易完全與人際關係無涉。事實上，魯曼隨後立刻補充說，在簡單的市場中，會有所謂的「二度人格化」（Granovetter等人理解的人際關係的社會鑲嵌！）(ibid: 199)。

所以，儘管接下來有好幾年的時間，魯曼在經濟方面的論著又繳了白卷，但在1983、84年卻接連發表好幾篇相關的文章（參見本書頁421-422所附本書原來各篇論文的出處），最後的成果便是1988年集結出版的《社會之經濟》。

就在魯曼於經濟方面的研究相對停滯的這段期間內，魯曼在思考上出現了一個自我生產的轉向，從原來的開放系統走向自我指涉系統，其具體成果即1984年出版的《社會系統：一般理論概論》(Luhmann, 1984a)。事實上，〈複雜性的時間化〉、〈體驗與行動〉、〈時間與行動〉與〈行動系統的時間結構〉等1970年代晚期的幾篇文章(1978c; 1981c[1978]; 1981d[1979]; 1981e[1980])，便已隱約浮現此一轉向的徵兆，其中一個關鍵即在嚴肅面對時間的問題。此後，魯曼不再在行動與溝通間猶豫不決，徹底出走帕深思的理論典範，轉而以溝通為社會的基本元素、社會學最終的分析單位，並一貫地堅持自我生產的觀念(1982f; 1983)，包括將這也用到功能系統上，而沒有考慮到就自我生產的概念來說，在自我生產系統內部再分化出自我生產的系統，邏輯上是有些自相矛盾的(Baecker, 2008: 118)⁶⁰。

60 因為，就像前面關於茁生的討論已指出的，自我生產建基於形成新的元素類型。我們固然可以說經濟的溝通有別於政治和科學的溝通，但問題是，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科學的溝通，終究都還是溝通，都屬於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無法說在社會之上又茁生出功能系統作為新的自我生產系統。事實上，魯曼自己對於這一點並非毫無意識（例如見本書頁56-57），而且並非所有系統理論的追隨者都遵循魯曼對於自我生產的嚴格二分界定，

Luhmann (1987e: 142) 日後在訪談中明確表示，視《社會系統》為自己的第一本代表作，至於之前為數已不少的論著，不過是為建構理論做準備的「零系列」而已。在魯曼為建構自己的社會理論的規劃中，《社會系統》只是個概論性的導論，主要在做理論與概念上澄清、介紹、引導入門的工作。接續這而來的應該是關於各個功能系統的個論，從各個領域來掌握社會這個整體，而《社會之經濟》正是此一系列的首次嘗試。最後，在個論之後應當還有個總其成的總論，也就是Luhmann(1997a)於去世前一年正式發表，好兌現自己三十年前規劃的《社會之社會》。

就作為個論系列的開路先鋒，《社會之經濟》在魯曼浩瀚的著作中有其獨特的地位。有別於日後同系列的《社會之法律》(2004a [1993])、《社會之藝術》(2000a[1995])、《社會之政治》(2000c)，與《社會之宗教》(2004b[2000])都是專書的形式，《社會之經濟》是一本論文集，而這也就清楚地顯示出，這是個初步的嘗試，還帶有很強的實驗性質。就像Bechmann & Stehr(2002: 67)在討論魯曼留給我們的遺產為何的悼念文章中指出的，一般來說，魯曼的論文往往具有實驗性質，有時甚至帶點嬉戲的筆調，或是以問號來結束。相對來說，專書就要求要有系統性的呈現，因此多半會有個體系清楚的章節結構安排。

例如，只要翻翻同系列其他書的目錄，不難看出其章名多半是魯曼後期著作中常出現的主要概念(組)，由此組成一個相對結構化的章節安排：功能、媒介與形式、一階與二階觀察、編碼與設立綱要、運

(續)

而不乏採取漸進立場者——尤其是從事經驗研究者。不過，話說回來，雖然要嚴格地貫徹自我生產的構想有其一定的困難，但是否因此便要完全放棄功能系統運作上封閉的想法，仍有待斟酌。在我看來，這麼做失去的將比得到的還要多。

作封閉與結構耦合、偶連性公式、演化、自我描述等。相對地，本書就顯得欠缺這種條理清楚的章節安排。像魯曼在前言(頁5)中提及要測試結構耦合的概念，但這個概念根本不會在本書的內容中出現，因為這實際上是他在撰寫相關文章時正在發展中的概念。也因此，前述這些主要概念雖然多少也在本書中提及，但不若後來那樣大量且一貫地使用。不過，在我看來，最令人感到惋惜的缺憾毋寧是，相較同系列的其他書來說，本書缺少對經濟系統分化出來的過程較為詳細的說明與探討，而且魯曼日後似也不曾在其他地方補起過這個縫隙。

因此，在某個意義下，《社會之經濟》在魯曼社會理論的個論系列中，算是比較弱的一本。魯曼在本書的前言(頁9)中便表示，關於經濟學的知識受益於其學生Dirk Baecker，另外也曾在訪談中表示，如果可以重新來過的話，希望能多學些數學與經濟學(Luhmann, 1987e: 140)。換句話說，在對經濟學的掌握上，魯曼自認是有所不足的。一定程度上，這當然會削弱魯曼對於經濟的思考深度，至少是削弱他對經濟學的批判火力。

然而，這只是個表象或部分的事實。以魯曼的著作來說，如Bechmann & Stehr也點出的，認為專書必然優於論文集這樣的評斷其實是有盲點的。之所以如此，跟魯曼本人的寫作習慣有很大的關係。眾所周知，魯曼的寫作是建立在他很有名的卡片盒的基礎上。對魯曼來說，不論是寫專書還是寫論文，往往就是在卡片與卡片之間、在概念與概念之間建立起連結。所以，魯曼的專書看似有層次分明的章節安排，其實背後一樣是蛛網式的思考風格，在章節與章節之間、在概念與概念之間，始終有著彼此互相指涉、界定、闡釋、啟發的循環關係。以《社會系統》這本書來說，Luhmann (1984a: 14)自己便明說這是個迷宮而非單行道，讀者可以從自己偏好的任一章開始讀起。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之經濟》與日後同系列看似比較嚴謹的

其他專書並無二致，只是沒有在章節名稱上明白打出系統理論特有的概念，而是按經濟領域本身的概念或議題來安排，但背後一樣是個網絡式的連結，在各篇之間依然有著密密麻麻的思想與概念上的連結，一樣提供了高品質，甚至更具原創性的理論思考與論述。在尚未為系統理論自己的概念「套牢」的情況下，本書藉由探討價格、支付、貨幣、市場、組織、決策、雙重循環等議題，展現出「深具雄心的謙遜」(ambitious modesty)——借用King & Schütz (1994)的標題來說，也就是建構一套跟經濟學高度「相似」(例如關於經濟功能的界定、視價格為訊號、從稀少性立論)，卻又與之截然不同、完整的、社會學的經濟理論，而不只是貨幣理論，不只是市場理論，不只是關於某個經濟現象或領域的社會學研究，彼此之間未能有所連結。

另外，最近人們才發現，原來魯曼不只有一套，而是有兩套卡片盒系統。根據其門下弟子，同時也是接任其教席的Rudolf Stichweh教授在“Ten Years After: Niklas Luhmanns Die G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這場紀念魯曼的國際研討會開幕餐會上的致辭，其中一個卡片盒推測自學生時代便已開始著手，因此看得到像跟國家考試有關的卡片。另外一個卡片盒則應是始自魯曼正式邁入學術生涯之時。有趣的是，研究這些卡片盒可以發現，魯曼通常不會把自己的東西再念過一次，不無忘掉自己曾有過的創新想法的可能，而且往往學生時代錯過沒念的，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補念。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魯曼向來對古典社會學大師談得相當少，畢竟他原本是念法律的。或許也正是因為欠缺和傳統的對話，迥異於以考古或綜合來推展社會學理論的習見做法，以致一般社會學家較難在魯曼的理論中發現可供銜接的點，而不利於系統理論的推廣與繼受。

儘管如此，若我們拿魯曼早期的著作與他後期的著作相比，將可輕易發現，在某個特定意義下，早期的論著看起來比較像社會學，還

能從字裡行間讀到濃濃的社會學味道。像《社會學啟蒙》系列早期的論文，便在跟社會學傳統對話，試圖重新概念化許多社會學重要的基本概念。可惜迄今只有《社會的分化》(Luhmann, 1982b)選擇性的英譯，其中魯曼檢討功能概念的文章全未譯出⁶¹，令人無法一眼清楚看出魯曼與結構功能論的差異，多少嚴重影響到英語世界後來對魯曼的繼受。到自我生產的轉向後，尤其是加入受到Spencer Brown啟發的形式概念，以及相應而來的一套關於區分及觀察的理論，引進觀察／運作、形式／媒介、運作封閉／結構耦合等成套的概念後，魯曼日益以自己自成體系的專門術語來寫作。雖然在這些論著背後作為指引的仍然是社會學的旨趣，但不論是對一般人還是對社會學家來說，都是個入門門檻極高的挑戰，也比較無法輕易便讀出其社會學的意涵，因此更不利於系統理論的推廣——尤其是在翻譯相對仍極欠缺的情況下。

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之經濟》作為介於前、後期之間過渡的嘗試，固然有其相對不成熟、實驗的一面，同時卻也有其極具原創與開創的一面，而且更易讓人讀出社會學的意涵，對一些自我生產轉向後的基本觀念往往也有較為簡明易懂的闡釋，令讀者不致因一層又一層的術語與理解障礙而卻步⁶²。以前面舉過的例子來說，魯曼在本書中便清楚地交代了不能把系統視為客體，而是要看做是能自己觀察自己的系統，也只能自己駕馭自己。相應地，系統並非由實體組成，而是由時間化了的事件組成。同時，魯曼也明白指出必須擺脫既有存有

61 關於魯曼如何看待功能與因果的問題，參見湯志傑(1992: Chap. 2)。

62 將1977年正式出版，同樣是論文合集的《宗教的功能》(Luhmann, 1977a)與日後的《社會之宗教》相較，人們也會有類似的感覺，但這些較早的著作發表於自我生產的轉向前，雖然仍可與魯曼日後的著作相銜接，但有時會顯得較不一貫，不若《社會之經濟》般獨特。

論的包袱，走向後存有論的轉向，掌握到偶連性公式同時具有必然與偶連的模態，掌握到經濟系統同時既是系統又是內環境，掌握到同一個事物可以有不同建構的可能。

另外，魯曼在本書第六章中以分岔的概念來談系統的運作動態以及歷史的形成，同時帶入濃縮／證成這一組雙向的關係，並以財產這個具體的例子來例示，依個人對魯曼依然屬有限的閱讀來說，這在日後的著作中毋寧是少見的或呈現得沒有如此清楚，往往逕自便以編碼的觀念討論，也不見得會把它與歷史的問題扣連在一起談。同時，就系統奠基於弔詭這個基本主張來說，個人也覺得本書從稀少性的弔詭切入來闡釋整個經濟系統的運作與動態，應是魯曼有關這個問題最為清楚、簡潔、系統及具說服力的闡述⁶³。

就像前引Stichweh教授在開幕致辭時說的，魯曼會不斷地修改舊稿，就《社會之社會》這本日後勢必會被人引來對魯曼蓋棺論定的巨著來說，尤其如此。在1997年正式出版前，不知已有過多少個不同版本的手稿，而最後出版的版本是否就必然較佳，其實是要打個問號的。在這個不斷改寫、不斷引入新觀念、不斷將理論繼續往前推展的過程中，一些被遺忘或甚至被放棄了的想法，不見得就比較差或比較不值得繼續發展下去。

就這點來說，由探索、開創與實驗性質居高的論文合集而成的本書，有其不容忽視的獨特價值。例如，魯曼在本書(頁333以後)中對事件、決策、期望、行動、結構等概念之間的關係，便有相對清楚的闡釋，尤其是談到了事件／結構的關係或所謂的事件—結構理論，這除了在《社會系統》及《信任》(Luhmann, 1989b[1968])兩書中曾有觸及外，日後很少再見到魯曼對此區分有所著墨，而多是以運作／結

63 另一個可以類比的例子是Luhmann (1988b)。

構的區分取代(如Luhmann, 1990c; 1993)。但到了《社會之社會》，魯曼終究還是要回頭使用這組區分，卻沒有對此做太多進一步的闡述。在我看來，事件/結構這組區分其實深具潛力，可由此開展出系統理論自己一套可用於歷史研究的結構化理論(Tang, 2007)。

對魯曼這位在與哈伯瑪斯論戰後日益奠定宗師地位的新作，尤其是在他邁出自我生產的轉向後推出的《社會之經濟》這本深具原創性的「新作」，德語學界自然不會忽略。一些重量級的學者，如法蘭克福學派出身，持左派立場的Claus Offe，以及以帕深思傳人自居，但並非像魯曼一樣是學習帕深思建構理論的技術，推陳出新，而更多是繼承帕氏對規範的強調的Richard Münch，便都有針對該書的書評⁶⁴。然而，或是基於理論立場的差異，或是因為尚無法跳脫社會學傳統的思考模式，跟不上魯曼自我生產轉向後的腳步，早期德語學界雖然沒有忽略《社會之經濟》，但一般的反應多較負面，尚無法深入掌握到魯曼在本書中開展出的新思維，遑論看出其長處。

像Offe(1990)便質疑說，一定要採取系統理論的觀點嗎？魯曼難道不是只是用系統理論特有的概念，對眾所周知的看法和提問做了些藝術性的花邊裝飾嗎？他舉例說像「市場因此是以自我指涉的循環這樣的形式，或是以雙重偶連性的形式顯現為環境」(本書頁84)這樣的句子雖然看來很有吸引力，但對實質的討論究竟有何幫助？相應於這個根本的質疑，他雖然樂於承認魯曼對稀少性的重新概念化有很好的闡明效果，但不認為一定要把這當作是關於自我指涉、弔詭及分岔的證據。Offe的疑惑觸及一個根本的關鍵：魯曼真的只是用繁複難解的概念複述了一些常識嗎？恰恰相反，系統理論的概念工具並非只是用

64 在《社會之經濟》出版前，Ganßmann (1986a; 1986b)便已從左派的立場，對魯曼把貨幣視為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看法做出尖銳的批評。由於該文已有英譯，此處不再做介紹。

來炫人耳目的工具，而是的確能帶來精確與深刻的洞見——與一般常識不必然相違背，卻又能更好地解釋它們的洞見。就像Offe也不得不承認魯曼對稀少性的討論極具啟發性——雖然魯曼的講法常常看來像再普遍不過的常識，但隨著整個論述繁複的開展，相信讀者絕不是只重溫了一遍常識，而是多了一層深刻的社會學的理解。

Münch (1990)的書評也有類似的問題，他認為魯曼不過是偏愛弔詭或套套邏輯的「語言遊戲」罷了。他完全不能同意經濟是個「自我生產的系統」，認為經濟系統藉由支付再生產出自己只是邏輯上為真而已，強調經濟的經驗現實僅取決於人們如何在稀少性、財產、貨幣、支付，以及尤其是極大化利益的觀點下做出決策。他主張，經濟相對於道德和政治的界限並非由支付不斷延續下去所產生，而是日常決策及鬥爭的成果，界限的界定必定是由行動者做出的。他最後還批評說，認為企業道德化及文化化的趨勢無法改變現代經濟系統自我生產的特性是錯誤的。

後來，Münch (1994)更以相互滲透的概念對魯曼做進一步的批評。但他的相互滲透概念有別於魯曼主要是用來指心理與社會系統共用意義的媒介，而是用來指帕深思所謂系統間的相互交換的關係⁶⁵。他強調，經濟與道德兩者間的相互滲透，支付與尊重兩者間的相互滲透，才是現代功能分化的建構原則，並據此把個人主義的職業倫理及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福利道德及福利經濟／環境道德及環境經濟詮釋為現代演進的三個階段。

如Beckert (2002[1997]: 207)就Münch的批評已指出的，魯曼理論的弱點並不在於把假定是規範性的動機從經濟行動者之中排除出去，或是喪失與道德、規範等議題的連結，因為系統理論不只是看自

65 對此的相關討論見湯志傑(2009)。

我指涉，而是一併看到了異己指涉⁶⁶。Beckert認為系統理論關鍵的弱點在於喪失了行動的面向，而Münch的批評也呈顯了同樣的觀點，但這樣的批評在系統理論看來只是源自行動論立場的偏見，並不具說服力。首先，如Stichweh(2000b)的分析指出的，行動與系統的概念並非不相容，真正構成替代關係的，是以溝通還是以行動作為建構理論的出發點。而就如前面的分析指出的，從溝通這個本身便意涵著社會性的概念出發，毋寧能更好地掌握及解釋社會性的問題。其次，Luhmann (1981c[1978]; 1984a: Chap. 4)事實上也沒有丟掉行動的概念，而只是對它進行重構，視之為衍生自溝通的「次要」建構，是溝通簡化了的自我觀察。隨著歸因於環境還是系統，溝通或是被視為體驗，或是被當作行動。行動論者只看到行動，而無法面對體驗的問題，就社會學的理论建構來說反而是不夠完整的。

儘管Beckert (2002[1997]: 206, 211)正確地看到魯曼對不確定性的問題有最深入而系統的討論，使得以不確定性作為建構理論的出發點變成不可置疑的典範，但他對系統理論的掌握其實不夠道地，常有似是而非的誤解，而這多少源自他無法放棄行動論與主體的立場。例如Beckert (2003: 772)認為系統是系統理論分析的基本單位，顯然理解有誤。如前面指出的，最基本的元素、最基本的分析單位應是作為事件，一出現就消失的溝通。同樣地，Beckert (2002[1997]: 208)認為魯曼與新古典經濟學最核心的差別在於拒絕所謂的極大化假定，相信親自讀過本書的人都會發現這係強加之見，毋寧是Beckert借魯曼的觀點來發展自己的理論綜合工作⁶⁷。

66 奇怪的是，Beckert (2002[1997]: 216)知道以此理由反駁Münch的批評，自己卻又犯下類似錯誤，認為系統理論主要只關注系統內部的運作，而無視於與環境的關係。

67 事實上，Beckert在此引的是《目的概念與合理性》這本Luhmann

Beckert (ibid: 212)甚至無視於Luhmann (1981g: 394)明說光以「滿足未來物質需要」來理解經濟的功能是「不足的」，而誤以為這在魯曼看來是個「構成性的問題」，它在社會上的重要性會產生出足夠的溝通，以致可以分化出一個經濟系統來。事實上，魯曼在該文中只說應把提問改為「究竟是哪個問題引導(leiten)了分化出特定是經濟的情境、角色及次系統」，強調「需要滿足在時間上的推移對經濟來說是構成性的」，因為這「擴大了目前的稀少性，並因此令社會緊張加劇」，而沒有說這個作為參照的問題就促成了經濟系統分化出來。如前面已指出的，魯曼認為，光是經濟的功能是無法令經濟分化出來成為一個功能系統的；在促成功能系統分化出來上，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毋寧扮有更重要的角色。Beckert無法正確掌握到這一點其實不令人訝異，因為他誤把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主要功能，理解為制約溝通的選擇(ibid: 213)，而不是像魯曼說的提高或促進溝通成功的機率。

在前述兩篇社會學家的書評之外，還有Brodbeck (1991)來自經濟學觀點的書評，主要用意在檢視《社會之經濟》是否如魯曼所說，提高了概念的精確度，從而能成功地對經濟學造成衝撞。雖然Brodbeck也嚴辭批判魯曼，但因為他選擇了不同於前兩篇書評的出發點，所以我們在此看到的主要反而是「同」而不是「異」：魯曼不過是重複經濟學早已說過的看法而已。例如，Brodbeck指出凱因斯早將對魯曼來說至關重要的「期望」概念引入經濟學之中了。認為經濟的範疇並非客觀的觀念，而不過是描述而已，也不是魯曼什麼獨到之見，海耶克便已說過，生產函數和貨幣等並非有形的東西，而只是人們關於事物的觀點而已。他還批評魯曼弄混了對價格的期望與價格，

(續)

(1973[1968])的早期著作，而不是《社會之經濟》。

認為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說能更好地說明價格的運動，而且視價格為訊息的承載者本來就是源自經濟學的洞見。最後，他批評說如果我們抱持「沒有主體的系統」這樣觀念的話，再也無法有意義地討論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如自由、暴力、寂寞等。從這些批評來看，顯而易見背後還是受到學科及意識形態立場的影響，相信明眼的社會學家絕不會把魯曼只看做是經濟學在社會學中的買辦。

或是鑑於學界普遍誤解《社會之經濟》的要旨，先有Hutter (1990)試著把系統理論「翻譯」成別人能懂的語言，接著有魯曼的入室弟子Baecker (1994a)撰文解釋「經濟作為自我指涉的系統」究竟是什麼意思，捍衛師說。事實上，隨著系統理論日益普及，早期的一些誤解慢慢獲得解消——排除因著理論立場差異而來的偏見不論。像後來Bode (2000)同樣是比較魯曼的理論與經濟學異同的文章，就比較能正確地掌握到系統理論的特色。他正確地觀察到系統理論後存有論的轉向，因此清楚地指出兩者的差異在於認識論、在於根本理論立場的差異。有別於經濟學仍主張一種物質性的元素，魯曼是從自我指涉、從循環的因果性出發，主張以時間化了的事件為元素，關心的是描述「經濟如何運作」⁶⁸，而不是這個作用方式所產生的結果，追問或關心一般意義下的因果，如經濟與非經濟(所謂社會)因素間變項式的因果關係，這才是系統理論與經濟學的關鍵差異所在，相信也是系統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的關鍵差異。從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經濟學忽略了回饋及自我指涉的問題，也無法掌握到多元脈絡的現象。反過來，在經濟學看來，欠缺因果分析的系統理論則是在分析上無力，在

68 借用Swedberg (1986)的說法，「經濟究竟如何運作」是經濟社會學要探究的最核心的問題。相對來說，「新經濟社會學」雖然以研究經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作自許，但大多數畢竟仍在研究「經濟與社會其他部分的關係」——而這正是Swedberg對結構功能論的批評之一。

實踐上無用。

從傳統主張線性因果，不認為現實是個自我指涉的過程這樣的觀點來看，對系統理論這樣的批評是成立的。然而，一旦我們承認或認知到自我指涉的問題，整個情形就會顛倒過來。因此，說到底，這終究還是個涉及選擇追隨那個典範的問題。從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它有能力對既有的說法做解釋，將它們包含進來，就像相對論把牛頓力學變成特例一樣，反之卻不然。考慮到這一點，相信何優何劣應當十分清楚。如果我們同意自我指涉及因之而來的弔詭是必須正視的問題的話，我們就不能再以以前那樣的方式建構理論，才不致淪為建在流沙上的巨廈，美則美矣，卻隨時有被自我指涉的問題掏空地基因而倒塌之虞。所以，縱使魯曼的理論還不夠完美，仍有不少待修正及進一步發展之處，但終究幫助社會學往前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後來Paul(2006: 418)在評價魯曼的經濟理論時，也不認為下述兩點對魯曼的主要批評是其理論失敗之處：一、並未把探討的焦點集中在經濟行動之社會(前提)條件與框架，並未探究鑲嵌的形式，而是分析一種社會溝通的形式(支付)，以此作為經濟行動的構成元素。這侵蝕了習慣上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的分工。二、魯曼概念化為經濟的東西，以及他概念化的方式，卻又不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所處理的課題本身：在他的理論中，理性的經濟施為者並未扮有重要角色，而交換或市場也不是他的理論的核心觀念⁶⁹。這兩個特徵，亦即被認定欠缺特定的社會學提問以及賦予貨幣作為經濟的「主體—客體」的特

69 魯曼的確不太談「交換」的問題，但他有明確交代為何他不認為交換是個好的理論出發點(本書頁13以後)。相對來說，交換是經濟學及社會學傳統常談的範圍，新經濟社會學對此甚少觸及才顯得奇怪——以個人有限閱讀來說，似乎只有經濟學出身的Zafirovski (2001)把這當作重要主題來處理，另外便是Nee & Ingram (1998)嘗試接上Homans交換論的傳統，但也沒有直接觸及交換的問題。

權，迄今仍是他迭遭批評的主要標的。Paul認為，這樣的批評射錯了箭靶，真正的問題在於像競爭這樣的機制竟然在魯曼的理論中近乎缺席。

然而，檢視本書(頁119以後)的內容，我無法同意Paul最後的批評。事實上，魯曼不但說明了為何競爭無法是個系統，而且還敏銳地指出競爭省下了衝突，在沒有創造出具體社會互動的情況下，仍使得社會的取向成為可能。經濟系統之所以能如此敏感、回應得如此迅速，毋寧正在於「互動」被省下了。相較來說，主張必須同時考慮到社會、組織、互動三個層次的系統理論毋寧還有其優勢，只從微觀視角出發的理論便看不到這一點。

在這些評論之外，還有一些將系統理論與其他理論進路比較的嘗試。例如Priddat(1995)比較了理性選擇、詮釋學，及系統理論關於作為「經濟人」意象基礎的主觀合理性的看法。Baecker(1996)則比較了系統理論與Simmel對於貨幣的看法。另外，Jessop(2001)比較了Polanyi、魯曼及法國的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的看法，認為三者同樣都主張經濟系統在運作上自主，但又都是社會地鑲嵌的，進而嘗試就三者的相異之處建構更為完整的一套理論。

至於就系統理論陣營本身來說，在魯曼之後的一些新發展也值得注意。首先是Dirk Baeker為數甚多關於經濟、組織，及管理等方面的論著(如1994b; 1999c; 2003a)，其中他的博士論文及教授資格論文尤其值得注意(1988; 1993)。雖然在我看來這兩本書偶有過度推論的毛病，但它們對魯曼的經濟理論來說是重要的補充，真正深入到經濟學的內部，以系統理論的觀點對它做了一番徹底的改寫。另外像他《銀行藉什麼行動》的小書(1991)，用具體的個案分析展現系統理論的洞見，也值得一讀。晚近他除了繼續有專書問世，尤其是寫了一本《經濟社會學》的導論書外(2006b)，還編了些有趣的書，像是討論貨幣及資本主義作為宗教的問題(2003b; 2003c)，將Deutschmann(1999;

2001)的新觀點引入，積極與之對話。由於Baecker著作甚多，除以上所述外，在此只挑幾篇國人易及的英文著作供參考(1992; 2001; 2006a; 2007a)。

同樣長期在經濟研究方面耕耘的還有Michael Hutter。他運用魯曼自我指涉系統的觀點來研究製藥業的專利權的個案(1989)，分析法律與經濟之間的結構耦合，對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的概念提出批評，指出它名義上雖重視溝通，實際上卻用理論的推理邏輯取代了真實的溝通。另外，Hutter除了和Teubner (1994; 英譯Teubner & Hutter, 2000)聯手對「經濟人」與「法律人」的虛構進行了精采的分析外，還研究了貨幣(1993; 1994a)與過剩/稀少的問題(1999)，而文化、藝術與經濟之間的結構耦合更一直是他的長期關心所在(如1986; 1994b; 2001; 2004; Hutter & Thorsby, 2007)，晚近還從「群眾運動」的視角探討市場，也就是評價系統的問題(2007)。

在Baecker和Hutter這兩位大將之外，主要從事法律方面研究的Gunther Teubner，間或也寫了些跟經濟有關的重要論文。除前引跟Hutter合寫的文章外，Teubner(1996a; Hutter & Teubner, 1993)還討論了「混血」(hybrid)作為解除甲詭的寄生者角色，多面目的網絡作為集體的行動者(1992; 英譯1993)，以及藝術與貨幣、契約與組織等法律與經濟的結構耦合的問題(Daintith & Teubner, 1986; Graber & Teubner, 1998)。此外，Teubner不但長期關注較為宏觀的議題，例如關於福利國家的體制、管制的三難及私有化等(1984; 1986; 1998; Teubner & Febbrajo, 1992)，也嘗試結合系統理論與解構的觀點，討論了禮物(2001)以及(尤其是由經濟實務推動的)法律全球化的問題(1996b; 1996c; 1997a; 1997b; 2004)，都頗具創見。

專長領域為心理研究與治療的Fritz B. Simon，也做了不少關於組織、管理，及經濟方面的研究(如2004a)，其中*Radikale Marktwirtschaft*:

*Grundlagen des systemischen Managements*也已分別有英譯(2004b)及簡體中譯(2007[2001])可供參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從事家族企業的研究(2005[2002]; Simon, Wimmer & Groth, 2005)，正好可以與本地的討論銜接及對話。

此外，魯曼義大利裔的女弟子Elena Esposito(2004)關於時尚研究的專著，也進一步拓展了系統理論關於消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研究，同樣值得注意。在這點上，值得引述Baecker(2006b, 93f.)對於流行的「符號消費」主張的批評，來呈現系統理論的不同觀點：由於現代經濟日益走向消費取向，以致人們往往假定，現在人們消費的只還有符號、聲望值、象徵、區別的標記等，而認為財貨與勞務的使用價值既不令人感興趣，甚至根本就不為消費者珍惜。然而，從系統理論立基於Spencer Brown觀察及區分的理論觀點來看，使用價值不可能獨立於它的形式，也就是不可能獨立於對它進行加工的區分。據此，符號消費的化約論觀點犯了雙重的錯誤。首先，在所有的社會中，就是使用價值中最具使用性的部分，一樣都還是透過區分的值(Distinktionswert)來駕馭的。其次，假定現代或後現代社會偏離這樣的狀態，因此是錯誤的。這種把當代經濟活動化約為「僅僅是」符號消費的觀點，本身無非是想在現代與所謂後現代社會間製造出一個區分，一個質上的差別，但從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現代與後現代社會在系統分化形式這個主要的社會結構上並無差異，只是人們現在有更好的準備，在語意上接受現代社會多中心、多元脈絡的事實罷了(Luhmann, 1995a; 2005[1992]: Chap. 1)。

最後，Urs Stäheli這位兼具後結構主義，與系統理論兩家之長的新秀也值得一提。根據系統理論的觀點，功能系統要能徹底分化出來，必須在角色的層次上建構出「大眾」(the public)的相應角色。從文化研究關心「大眾」、「流行」的角度出發，Stäheli (1997, 2003a)

探討了流行的語意，以及大眾在政治系統中的角色，把這與系統理論關於涵括的討論關聯起來，晚近更把焦點轉移到經濟系統，從「股票」、「投機」等議題切入，探討經濟系統對於大眾的形塑與涵括(2001; 2003b; 2007)。

在魯曼及其弟子筆耕不輟的努力下，在經濟研究方面，除了日本早形成自己的傳統外⁷⁰，就以英語發表為主的國際學界來說，慢慢也出現一些系統理論的追隨者，或採取系統理論進路的研究(如 Andersen, 2000; Arnoldi, 2004; Daly, 2004; Fleischmann, 2005; Fotopoulos, 2000; Hessling & Pahl, 2006; Larsson, 2003; Pixley, 2002; Webb, 2004)。這些研究呈現出兩個特色，一是多集中在研究貨幣、金融方面，另一是作者常出身自北歐研究系統理論的社群。這種相對集中的現象雖有助於深化，卻不利於拓展。因此，一定意義下，系統理論仍有大片仍待開發的處女地可供開拓。從好的方面來說，這表示系統理論有著光明的前景。但反過來，如果系統理論無法吸引其他學者繼續投入，尤其是從事實際的經驗研究，那麼在當前講求競爭與發展的學界生態下，長期下來恐怕不免要暗淡。如果我們同意Beckert (1996)說的，不確定性的問題是經濟社會學的利基或阿基米得點所在的話(見湯志傑，2009)，相信系統理論終能突破語言的障礙，成功地在經濟研究方面開展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70 在日本引介魯曼的土方透(Toru Hijikata)，便是位經濟學者，不但曾跟 Armin Nassehi這位德國的系統理論學者合編了一本關於風險決策的德文書(Hijikata & Nassehi, 1997)，目前也是《社會系統》這份系統理論的旗艦刊物的顧問。由於個人尚不諳日文，兼之日本學者主要還是以日文寫作，國際能見度不高，所以無法在此多做介紹。

四、譯者說明與致謝

如前面已說明的，魯曼追求的是Gesellschaftstheorie(theory of society)，而不是social theory——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稱呼，主要係為了跟學院建制化的社會學理論做區隔，好宣稱自己更為廣含及一般。就如前面已提及的，社會在魯曼的使用中是雙義的，但無論如何很清楚的是，魯曼企圖探討的，既是整體的，同時也是廣含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下等同於the social），而不是把組織與互動排除在外，只研究社會這個系統層次——雖然這是他主要著力所在。尚請讀者清楚牢記這一點，因為我們翻譯本書時，除非是易於造成混淆之處，我們才會採用「全社會」、「總體社會」、「整個社會」等譯法，否則多半還是譯成「社會」，以免累贅。

其次要說明的是，基於正確及精益求精的考慮，我們更改了一些舊的譯法。首先是autopoiesis這個關鍵概念，我們不再沿襲「自我再製」的舊譯法，而是直接照其希臘文原來的意思，譯做自我生產（auto：自我；poiesis：生產）。舊有的譯法考慮到避免與原有生物學的用法有過強的關聯，或是與生命的不當聯想，有其一定的好處，也可以與結構主義後來「再生產」、「實做」的轉向相呼應，但基於與原文的精確對應，現統一改譯為自我生產。

另外一個重要改變，是以更符合中文表達方式的「編碼」（Codierung）、「設立綱要」（Programmierung）取代原有「符碼化」、「綱要化」的直譯。符碼化和綱要化的拗口翻譯，雖然有讓讀者清楚意識到這是系統理論的特定概念的好處，卻也要付出不通順及不易理解的代價。在考慮到系統理論的入門障礙已經夠多的情況下，我們現在選擇優先照顧未入門及初入門者的需要，相信已入門的讀者自然就

可輕易掌握到名詞背後的意思，以及原來與之對應的精確概念。

此外，本書將原書的注腳與譯者所加的譯注統一排序，但會在注腳的最前面以[譯者注]指明係譯者所加的注釋。另外以中括號括起來的內容，係譯者為促進理解額外加入的文字，為原文所無。至於在本書翻譯的分工上，由湯志傑先就原文譯出一份初稿，交由魯貴顯逐一校定後，兩人再共同討論決定譯文的內容，最後再由湯志傑統一做文字潤飾的工作，由魯貴顯負責魯曼生平年表及主要著作選錄的工作。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不少「外文」的問題，必須求助於許多朋友，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康士林、李威霆、劉名峰、王貞文、李航、倪安宇、王柏偉、李君韜、蘇碩斌等人，協助解決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及日文等方面的翻譯問題。

如果翻譯事實上是個改寫、再創造的話，那麼譯作究竟是出現在什麼樣的脈絡中，試圖傳遞什麼訊息，毋寧是值得做番自我分析的。但限於篇幅以及自我分析上的不成熟，同時也是為了避開角色上的尷尬，我不打算在此做這樣的交代，相信這篇導論以及許多的譯注已經留下足夠的線索。值得在這個脈絡下一提的是，如果「經濟」這個譯名最初是在「經世濟民」這種道德考量——令經濟隸屬於道德秩序之下——下才脫穎而出的話(金觀濤、劉青峰，2003)，我們今天是否已真地擺脫了這種觀點的糾纏，從普遍的道德切換到各個領域特有的道德，走向多元脈絡的建構？還是，我們仍然在許多不同的秩序之間掙扎、游移，同時根據許多源自不同時代與背景的邏輯來運作？

在目前各種評鑑制度逼著大家求新、求快，很難有完整的時間可以好好靜下心來想大問題的學術生態中，喜歡追究根本問題的系統理論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然而，當年一心求發表的Granovetter固然壓根不會想到，也沒有義務去想「新經濟社會學」接下來的議程為何，但「新經濟社會學」發展到今日，如何在理論上深化，提出自己

一套不但能挑戰經濟學，甚至也能挑戰既有社會學的理论，實已是日益迫切的任务(湯志傑，2009)。遺憾的是，不論是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或是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與知識社會學分析都告訴我們：一門學科或分支領域愈成熟，往往也就愈封閉，或者甚至應該倒過來說是因為封閉才成熟的(Fuchs & Turner, 1996)。這雖然能在相互承認的基礎上帶來具備更高「科學性」的好處，往往卻也要付出代價，例如喪失與現實的關聯、排除異己、抑止具原創性的冒險等等。相較於社會科學中最建制化、最成熟的經濟學，相信讀者不難理解這種做法的優缺點何在。基於這樣的認知，讓「新經濟社會學」跟不同物種的系統理論對話，就變得很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跨越它自己既有的認知框架與區分，真正迸出知識的火花。希望這本譯作的誕生有助於對系統理論的理解，進而能促成系統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之間更多的對話。促進理解與對話，相信是任何從事翻譯這項公共服務的學者們最期待，也最感欣慰之事。

湯志傑 台北南港

2008年3月初稿，10月刪節修訂完稿⁷¹

2009年8月定稿

71 在本文初稿完成，總算可將全數完成的譯稿(2007年8月)一併送審，等待審查意見的過程中，蒙蔡博方惠賜由余瑞先、鄭伊倩所譯的《社會的經濟》的簡體中文譯本(2008年6月)，才赫然驚覺原來本書不但不是唯一的中譯本，而且還會是難脫參考前譯本之嫌，晚出的譯本。不過，在略為瀏覽一下簡體譯本之後，我放下了這樣的擔心。相信任何對兩個譯本做比對的人，都不會認為我們的翻譯是抄襲或參考前譯本的結果。仍然令人擔憂的是，由於簡體譯本擁有早出及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的優勢，在現有的經濟運作法則之下，是否會因此出現劣幣逐良幣的反淘汰？

參考文獻

金觀濤、劉青峰

2003 〈從「經世」到「經濟」：社會組織原則變化的思想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2：139-189。

張清溪等

1987 《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上冊(台北：雙葉)。

湯志傑

1992 《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及對法律的社會學分析》。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a 〈理論作為生命：悼念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當代》，136：8-19。

1998b 〈社會自主性如何可能？以盧曼的系統理論拓深台灣社會自我描述的初步構想〉。《當代》，136：36-53。

2004a 〈藉公共領域建立自主性(上)：對西方公/私區分語意及結構之探討〉。《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0：121-184。

2004b 〈藉公共領域建立自主性(下)：對華人政治優位性傳統的反省〉。《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1：173-255。

2007 〈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13：71-128。

2009 〈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9：135-193。

魯貴顯

1998 〈盧曼系統理論的功能概念〉。《當代》，136：23-35。

Ahlemeyer, Heinrich W.

2002[1996] *Geldgesteuerte Intimkommunikation: Zur Mikrosoziologie heterosexueller Prostitution* (Gießen: Psychosozial-Verlag).

Albert, Mathias & Lena Hilkermeier (eds.)

2004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iklas Luhmann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ersen, Niels Åkerstrøm

2000 "Public Market -Political Firms", *Acta Sociologica* 43, 1: 43-61.

Arnoldi, Jakob

2004 "Derivatives: Virtual Values and Real Risk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1, 6: 23-42.

Baecker, Dirk

1988 *Information und Risiko in der Marktwirt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1 *Womit handeln Banken? Eine Untersuchung zur Risikoverarbeitung in der Wirt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2 "The Writing of Accounting", *Stanford Literature Review* 9: 157-178.

1993 *Die Form des Unternehmens*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4a "Die Wirtschaft als selbstreferentielles soziales System", pp. 17-45 in *Der Wandel der Wirtschaft: Soziologische Perspektiven*, edited by Elmar Lange (Berlin: Edition Sigma).

1994b *Postheroisches Management: Ein Vademecum* (Berlin: Merve).

1996 "Conditions of Money's Compliance: Georg Simmel and Sociological Systems Theory", *Sociologia Internationalis* 34: 13-39.

1999a "Gypsy Reason: Niklas Luhmann's 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 *Cybernetics & Human Knowing* 6, 3: 5-19.

1999b *Problems of For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c *Organisation als System: Aufsätz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 2001 “Managing Corporations in Networks”, *Thesis Eleven* 66: 80-98.
- 2003a *Organisation und Management: Aufsätze* (Frankfurt a.M.: Suhrkamp).
- 2003b *Kapitalismus als Religion*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 2003c *Viele Gelder*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 2006a “The Form of the Firm”, *Organization* 13, 1: 109-142.
- 2006b *Wirtschaftssoziologie* (Bielefeld: Transcript).
- 2006c “Market”, pp. 333-335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Austin Harrington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 2006d “Network”, pp. 394-396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Austin Harrington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 2007a “A Note on Max Weber’s Unfinished Theory of Economy and Society”, *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tronic Newsletter* 8, 2: 27-30.
- 2007b “The Network Synthesis of Social Action”, (<http://homepage.mac.com/baecker/NetworkSynthesis.pdf>).
- 2008 “Wirtschaft als funktionales Teilsystem”, pp. 109-123 in *Handbuch für Wirtschaftssoziologie*, edited by Andrea Mauer (Wiesbaden: VS Verlag).
- Bakken, Tore & Tor Hernes (eds.)
- 2003 *Autopoietic Organization Theory: Drawing on Niklas Luhmann’s Social Systems Perspective* (Herndon, VA: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 Bateson, Gregory
- 2003[1979] *Mind and Nature* (《心智與自然》，章明儀譯)(台北：商周)。
- Bechmann, Gotthard & Nico Stehr
- 2002 “The Legacy of Niklas Luhmann”, *Society* 39, 2: 67-75.
- Becker, Gary S.
-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ckert, Jens

1996 “What is Sociological about Economic Sociology? Uncertainty and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A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5: 803-840.

2002[1997] *Beyond the Market: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tr. by Barbara Harsha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Economic Sociology and Embeddedness: How Shall We Conceptualize Economic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7, 3: 769-787.

200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Embeddedness: Karl Polanyi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Max-Planck-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Discussion Paper 07/1.

Blühdorn, Ingolfur

2000 “An Offer One Might Prefer to Refuse: The Systems Theoretical Legacy of Niklas Luhman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3, 3: 339-354.

Bode, Otto F.

2000 “Die Ökonomische Theorie und die Systemtheorie Niklas Luhmanns”, pp. 179-208 in *Niklas Luhmanns Denken: Interdisziplinäre Einflüsse und Wirkungen*, edited by Helga Gripp-Hagelstange (Konstanz: Universitätsverlag Konstanz).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dbeck, Karl-Heinz

1991 “Wirtschaft als autopoietisches System? Anmerkungen zu N. Luhmanns Buch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38, 3: 317-326.

Callon, Michel

1998a *The Laws of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1998b “Introduction: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 pp. 1-57 in *The Laws of Markets*.

Clam, Jean

2000 “System’s Sole Constituent, the Operation: Clarifying a Central Concept of Luhmannian Theory”, *Acata Sociologica* 43, 1: 63-79.

2002 *Was heißt, sich an Differenz statt an Identität orientieren? Zur Deontologisierung in Philosophie und Sozialwissenschaft* (Konstanz: UVK Verlagsgesellschaft).

Daintith, Terence & Gunther Teubner (eds.)

1986 *Contract and Organization: Legal Analysis in the Ligh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Daly, Glyn

2004 “Radical(ly) Political Economy: Luhmann, Postmarxism and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1, 1: 1-32.

Deutschmann, Christoph

1999 *Die Verheißung des absoluten Reichtums: Zur religiösen Natur des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M.: Campus).

2001 “Capitalism as Religion? An Unorthodox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ship”,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4, 4: 379-386.

Elder-Vass, Dave

2007 “Luhmann and Emergentism: Competing Paradigms for Social Systems Theor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7, 4: 408-432.

Elias, Norbert

1994[1937]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 by Edmund Jephcot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Esposito, Elena

- 2004 *Die Verbindlichkeit des Vorübergehenden: Paradoxien der Mode*, tr. by Alessandra Corti (Frankfurt a.M.: Suhrkamp).

Fleischmann, Anselm

- 2005 “A Model for a Simple Luhmann Economy”,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 Social Simulation* 8, 1: 1-28.

Fligstein, Neil

- 1996 “Market as Politics: A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4: 656-673.
- 2001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2 “Agreements, Disagre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Markets’”, pp. 61-78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edited by Mauro F. Guillén, Randall Collins, Paula England & Marshall Meye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Fotopoulos, Takis

- 2000 “Systems Theory and Complexity: A Potential Tool for Radical Analysis or the Emerging Social Paradigm for the Internationalised Market Economy”, *Democracy & Nature* 6, 3: 421-446.

Foucault, Michel

- 1967[1961]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 by Richard Howard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1977[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ourcade, Marion

- 2007 “Theories of Markets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8: 1015-1034.

Fuchs, Stephan

2001 *Against Essentialism: A Theo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uchs, Stephan & Jonathan H. Turner

1986 “What Makes a Science ‘Mature’?: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al Control in Scientific Produc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4, 2: 143-150.

Fullbrook, Edward (ed.)

2002 *Intersubjectivity in Economics: Agents and Structures* (London: Routledge).

Ganßmann, Heiner

1986a “Geld: Ein 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s Medium der Kommunikation? Zur Geldlehre in der neueren Soziologie”, *Prokla* 63: 6-22.

1986b Money: “A Symbolically Generalized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Concept of Money in Soci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17: 285-316.

Gershon, Illana

2005 “Seeing Like A System: Luhmann for Anthropologist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5, 2: 99-116.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1990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lanville, Ranulph

1981 “The Same is Different”, pp. 252-262 in *Autopoiesis: A Theory of Living Organization*, edited by Milan Zeleny (New York: North Holland).

González-Díaz, Emilio

2004 “Paradox, Time, and De-Paradoxication in Luhmann: No Easy Way Out”,

World Futures 60: 15-27.

Graber, Christoph Beat & Gunther Teubner

1998 “Art and Money: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Private Sphere?”, *Oxford Journal Legal Studies* 17: 61-74.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510.

1990 “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 History and an Agenda”, pp. 89-112 in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Roger Friedland & A. F. Roberts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Günther, Gotthard

1979 “Life as Poly-Contextuality”, pp. 283-306 in *Beiträge zur Grundlegung einer operationsfähigen Dialektik*, Vol. 2 (Hamburg: Felix Meiner).

Habermas, Jürgen & Niklas Luhmann

1971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Frankfurt a.M.: Suhrkamp).

Hahn, Alois

1987 “Soziologische Aspekte der Knappheit”, pp. 119-132 in *Soziologie wirtschaftlichen Handelns*, edited by Klaus Heineman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Hall, Peter A. & Rosemary C. R.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XLIV: 936-957.

Herting, Stephan & Lars Stein

2007 “The Evolution of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with Focus on the

Constructivist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 36, 1: 1-17.

Hessling, Alexandra & Hanno Pahl

2006 “The Global System of Finance. Scanning Talcott Parsons and Niklas Luhmann for Theoretical Keystone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Sociology* 65, 1: 189-218.

Heylighen, Francis

1989 “Causality as Distinction Conservation: A Theory of Predictability, Reversibility, and Time Order”, *Cybernetics and System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 361-384.

Hutter, Michael

1986 “Kunst als Quelle wirtschaftlichen Wachstums”, *Zeitschrift für A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31, 2: 231-245.

1989 *Die Produktion von Recht: Eine selbstreferentielle Theorie der Wirtschaft, angewandt auf den Fall des Arzneimittelpatentrechts* (Tübingen: J.C.B. Mohr).

1990 “Welchen Unterschied macht die Systemtheorie? Ein Übersetzungsversuch von Luhmanns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KYKLOS* 43, 3: 485-494.

1993 “The Emergence of Bank Notes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A Case Study for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Change”, *Sociologia Internationalis* 31, 1: 23-39.

1994a “Communication in Economic Evolution: The Case of Money”, pp. 111-136 in *Evolutionary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edited by Richard W. Engla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b “Stichwort: Kulturökonomik”, pp. 57-72 in *Kulturmanagement: Theorie*

und Praxis einer professionellen Kunst, edited by Hermann Rauhe & Christine Demme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1999 "Wie der Überfluß flüssig wurde: Zur Geschichte und zur Zukunft der kanppen Ressourcen",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5, 1: 41-54.
- 2001 "Structural Coupling between Social Systems: Art and the Economy as Mutual Sources of Growth",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7, 2: 290-313.
- 2004 "Pop: Kunst durch Markt."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10, 2: 325-332.
- 2007 "Are Market Like Protest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of Valuation Systems",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13, 1+2: 32-45.

Hutter, Michael & Gunther Teubner

- 1993 "The Parasitic Role of Hybrid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9, 4: 706-715.
- 1994 "Der Gesellschaft fette Beute: *Homo juridicus* und *homo oeconomicus* als kommunikationserhaltende Fiktionen", pp. 110-145 in *Der Mensch - das Medium der Gesellschaft?* edited by Peter Fuchs & Andreas Göbel (Frankfurt a.M.: Suhrkamp).

Hutter, Michael & David Throsby(eds.)

- 2007 *Beyond Price: Values in Culture, Economics and the Ar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obson, Arthur

- 1995 "Habermas and Luhmann in the American Legal Tradition",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14: 3-11.

Jessop, Bob

- 2001 “Regulationist and Autopoieticist Reflections on Polanyi’s Account of Market Economies and the Market Society”, *New Political Economy* 6, 2: 213-232.

Kauffman, Louis H.

- 1987 “Self-Reference and Recursive Forms”, *Journal of Social and Biological Structure* 10: 53-72.

Kieserling, André

- 1999 *Kommunikation unter Anwesenden: Studien über Interaktionssysteme* (Frankfurt a.M.: Suhrkamp).

King, Michael & Anton Schütz

- 1994 “The Ambitious Modesty of Niklas Luhman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1, 3: 261-287.

King, Michael & Chris Thornhill

- 2003 *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Politics and La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King, Michael & Chris Thornhill (eds.)

- 2006 *Luhmann on Law and Politics: Critical Appraisal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Knorr Cetina, Karin

- 2006 “Microsociology of Markets”, pp. 449-451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Jens Beckert & Milan Zafirovski (London: Routledge).

Knorr Cetina, Karin & Alex Preda (eds.)

- 2005 *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ippner, Greta

2001 “The Elusive Market: Embeddedness and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30: 775-810.

Larsson, Bengt

2003 “Neo-Liberalism and Polycontextuality: Banking Crisis and Re-Regulation in Sweden”, *Economy and Society* 32, 3: 428-448.

Leifer, Eric M.

1985 “Markets as Mechanism: Using a Role Structure”, *Social Forces* 64, 2: 442-472.

Luhmann, Niklas

1958 “Der Funktionsbegriff in der Verwaltungswissenschaft”, *Verwaltungsarchiv* 48: 97-105.

1960 “Kann die Verwaltung wirtschaftlich handeln”, *Verwaltungsarchiv* 51: 97-115.

1964 *Funktione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6 “Die Bedeutung der Organisationssoziologie für Betrieb und Unternehmung”, *Arbeit und Leistung* 20: 181-189

1970a[1962] “Funktion und Kausalität”, pp. 9-30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Aufsätze zur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0b[1962] “Wahrheit und Ideologie”, pp. 54-65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970c[1964] “Funktionale Methode und Systemtheorie”, pp.31-53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970d[1966] “Reflexive Mechanismen”, pp. 92-112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970e[1967]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pp. 66-91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970f[1967] “Soziologie als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pp. 113-136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 1970g[1968] “Gesellschaft”, 137-153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 1970h “Wirtschaft als soziales System”, pp. 204-231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 1970i[1968] “Soziologie des politischen Systems.”pp. 154-177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 1971a[1964] “Zweck–Herrschaft–System: Grundbegriffe und Prämissen Max Webers”, pp. 90-112 in Jürgen Habermas / Niklas Luh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71b[1969] “Moderne Systemtheorie als Form gesamtgesellschaftlicher Analyse”, pp. 7-24 in Jürgen Habermas & Niklas Luh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 1975a[1974] “Einführende 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r Kommunikationsmedien”, pp. 170-192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2. Aufsätze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pal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75b “Interaktion, Organisation, Gesellschaft: Anwendung der Sytemtheorie”, pp. 9-20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2*.
- 1976 “Generalized Media and the Problem of Contingency”, pp. 507-532 in *Explorations in General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Talcott Parsons*, Vol. 2. edited by J. J. Loubser, R. C. Baum, A. Effrat & V. M. Lidz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7a *Funktion der Religion*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77b “Interpenetration – Zum Verhältnis personaler und sozialer System”,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6, 1: 62-76.
- 1978a “Interpenetration bei Parsons”,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7, 3: 299-302.
- 1978b “Geschichte als Prozeß und die Theorie sozio-kultureller Evolution”, pp. 413-440 in *Historische Prozesse*, edited by Karl-Georg Faber & Christian

- Meier (München: DTV).
- 1978c “Temporalization of Complexity”, pp. 95-111 in *Sociocybernetics: An Actor-Oriented Social Systems Approach*, Vol. 2, edited by R. F. Geyer & Johannes van der Zouwe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 1980 “Die Ausdifferenzierung von Erkenntnisgewinn: Zur Genese von Wissenschaft”, pp. 102-139 in *Wissenssoziologie*, edited by Nico Stehr & Volker Meja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81a “Communication about Law in Interaction Systems”, pp. 234-256 in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Sociologies*, edited by K. Knorr-Cetina & A. V. Cicourel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1b[1976] “Ausdifferenzierung des Rechtssystems”, pp. 35-52 in *Ausdifferenzierung des Rechts: Beiträge zu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81c[1978] “Erleben und Handeln”, pp. 67-80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3. Soziales System, Gesellschaft, Organisation* (Opal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81d[1979] “Zeit und Handlung – Eine vergessene Theorie”, pp. 101-125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3*.
- 1981e[1980] “Temporalstrukturen des Handlungssystems: Zum Zusammenhang von Handlungs- und Systemtheorie”, pp. 126-150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3*.
- 1981f[1974] “Symbiotische Mechanismen”, pp. 228-244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3*.
- 1981g “Organisation im Wirtschaftssystem”, pp. 390-414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3*.

- 1982a “The World Society as a So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 8: 131-138.
- 1982b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 by Stephen Holmes & Charles Larmo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2c “World-Time and System History: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emporal Horiz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pp. 289-323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 1982d[1973] “The Self-Thematization of Societ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cept of Reflection”, pp. 324-362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 1982e “Die Voraussetzung der Kausalität”, pp. 41-50 in *Zwischen Technologie und Selbstreferenz: Fragen an Pädagogik*, edited by Niklas Luhmann & Karl Eberhard Schorr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82f “Autopoiesis, Handlung und kommunikative Verständig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1, 366-379.
- 1983 “Insistence on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s from Germany – An Essay”, *Social Forces* 61, 4: 987-997.
- 1984a *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84b[1977] *Religious Dogmat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 tr. by Peter Beyer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譯自: *Funktion der Religion*, Chap. 2)
- 1985a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Zur Geschichte einer Ide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85b “Einige Probleme mit ‘reflexivem Recht’”, *Zeitschrift für Rechtssoziologie* 1: 1-18.

- 1986 “The Autopoiesis of Social Systems”, pp. 172-192 in *Sociocybernetic Paradox: Observation, Control and Evolution of Self-Steering Systems*, edited by Felix Geyer & Johannes van der Zouwen (London: Sage).
- 1987a “The Evolutionary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Interaction”, pp. 112-131 in *The Micro-Macro Link*, edited by Jeffrey C. Alexander, Bernhard Giesen, Richard Münch & Neil J. Smels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7b “Die Differenzierung vo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und ihre gesellschaftliche Grundlagen”, pp. 32-48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4: Beiträge zur funktionalen Differenzierung der Gesellschaf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87c “Die Unterscheidung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pp. 74-103 i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4*.
- 1987d[1980] *Rechtssoziologi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87e *Archimedes und Wir* (Berlin: Merve).
- 1987f[1969] “Modern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pp. 173-186 in *Modern German Sociology*, edited by Volker Meja, Dieter Misgeld & Nico Steh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8a *Erkenntnis als Konstruktion* (Bern: Benteli Verlag).
- 1988b “The Third Question: The Creative Use of Paradoxes in Law and Legal History”,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5, 2: 153-165.
- 1989a “Individuum, Individualität, Individualismus”, pp. 149-258 in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Vol. 3.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89b[1968] *Vertrauen: Ein Mechanismus der Reduktion sozialer Komplexität*, 3rd edition (Stuttgart: Enke).

- 1990a “The Paradox of System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pp. 409-440 i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effrey C. Alexander & Paul Col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0b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lfare Stat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譯自 : Politische Theorie im Wohlfahrtsstaat)
- 1990c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90d “The Self-Reproduction of Law and Its Limits”, pp. 227-245 in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0e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5: Konstruktivistische Perspektiv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90f “Sthenography”, *Stanford Literature Review* 7, 1-2: 133-137.
- 1991a[1988] 《社會的經濟》, 春日淳一譯(東京: 文真堂)。(譯自 :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 1991b “Sthenographie und Euryalistik”, pp. 58-82 in *Paradoxien, Dissonanzen, Zusammenbrüche. Situation offener Epistemologie*, edited by Hans Ulrich Gumbrecht & K. Ludwig Pfeiffer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92a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Cardozo Law Review* 13, 2: 1419-1441.
- 1992b “Wer kennt Wil Martens? Eine Anmerkung zum Problem der Emergenz sozialer System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4: 139-142.
- 1992c “The Form of Writing”, *Stanford Literature Review* 9: 25-42.
- 1993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94a “Die Tücke des Subjekts und die Frage nach den Menschen”, pp. 40-56 in *Der Mensch: Das Medium der Gesellschaft*, edited by Peter Fuchs &

- Andreas Göbel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94b “Observing Re-entries”, *Protosoziologie* 6: 4-13.
- 1995a “Why Does Society Describe Itself as Postmodern?”, *Cultural Critique* 30: 171-186.
- 1995b “The Paradox of Observing Systems”, *Cultural Critique* 31: 37-55.
- 1995c “Das Risiko der Kausalität”, *Zeit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sforschung* 9/10: 107-119.
- 1997a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97b “Globalization or World Society: How to Conceive of Modern socie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7, 1: 67-80.
- 2000a[1995] *Art as a Social System*, tr. by Eva M. Knod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譯自： *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
- 2000b[1996] *The Reality of the Mass Media*, tr. by Kathleen Cro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譯自： *Die 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 2000c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edited by André Kieserling (Frankfurt a.M.: Suhrkamp).
- 2000d *Organisation und Entscheid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2001[1986] 《生態溝通：現代社會能應付生態危害嗎？》，湯志傑、魯貴顯譯(台北：桂冠)。(譯自：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 2002 *Einführung in die Systemtheorie*, edited by Dirk Baecker (Heidelberg: Carl-Auer-Systeme Verlag).
- 2004a[1993] *Law as a Social System*, tr. by Klaus A. Ziege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譯自：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 2004b[2000] 《社會的宗教》，周怡君等譯(台北：商周)。(譯自： *Die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
- 2005[1992] 《對現代的觀察》，魯貴顯譯(台北：左岸)。(譯自： *Die*

Beobachtung der Moderne)

2006[1996] 《大眾媒體的實在》，胡育祥、陳逸淳譯(台北：左岸)。(譯自：*Die 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2009[1995] 《社會中的藝術》，張錦惠譯(台北：五南)。(譯自：*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

Maciejewski, Franz (ed.)

1973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Beiträge zur Habermas-Luhmann-Diskussion 1*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74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Beiträge zur Habermas-Luhmann-Diskussion 2* (Frankfurt a.M.: Suhrkamp).

MacKenzie, Donald, Fabian Muniesa & Lucia Siu (ed.)

2007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kropoulos, Michael

1997 *Modernität und Kontingz* (München: Fink).

2004 “Kontingz: Aspekte einer theoretischen Semantik der Moderne”,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45, 3: 369-399.

Martens, Wil

1991 “Die Autopoiesis sozialer System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3: 625-646.

1992 “Die partielle Überschneidung autopoietischer Systeme: Eine Erwiderung”,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4: 143-145.

Mathur, Piyush

2005 “Neither Cited Nor Foundational: Niklas Luhmann’s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Exegesis and Some Theore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of a Field”,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8: 329-362.

Maturana, Humberto R. & Francisco J. Varela

1980[1972]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McGinn, Kathleen L. & Angela T. Keros

2002 “Improvisation and the Logic of Exchange in Socially Embedded Transac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7, 3: 442-473.

Moeller, Hans-Georg

2006 *Luhmann Explained: From Souls to Systems* (Chicago: Open Court).

Montgomery James D.

1998 “Toward a Role-Theoretic Conception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1: 92-125.

Münch, Richard

1990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 ein autopoietisches System?*, *Soziologische Revue* 13: 381-388.

1994 “Zahlung und Achtung: Die Interpenetration von Ökonomie und Moral”,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23, 388-411.

Muniesa, Fabian, Yuval Millo & Michel Callon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Market Devices”, pp. 1-12 in *Market Devices*, edited by Mickel Callon, Yuval Millo & Fabian Muniesa (Oxford: Blackwell).

Nau, Heino Heinrich

1997 *Ein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 Max Weber und die Begründung der Sozialökonomik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Ökonomie 1871 bis 1914*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Nee, Victor & Paul Ingram

1998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stitutions, Exchange,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19-45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edited by Mary C.

Brinton & Victor Nee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

O'Connell, Peter J.(ed.)

1991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社會學辭典》，彭懷真等譯)(台北：五南)。

Offe, Claus

1990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Soziologische Revue* 13: 389-393.

Orléan, André

1989 “Mimetic Contagion and Speculative Bubbles”, *Theory and Decision* 27: 63-92.

Paul, Axel T.

2006 “Luhmann, Niklas”, pp. 417-419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Jens Beckert & Milan Zafirovsk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iore, Michael J.

1996 “Review of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4: 741-754.

Piore, Michael J. & Charles F. Sable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Pixley, Jocelyn

2002 “Finance Organizations, Decisions and Emo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3, 1: 41-65.

Podolny, Joel

1993 “A Status-Based Model of Market Compet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829-872.

Priddat, Birger P.

1995 “Rational Choice, Hermeneutik und Systemtheorie: Ein Beitrag zur Subjektivierung des Akteurs auf Null”, *Sociologia Internationalis* 33, 2: 127-146.

Quine, Willard van O.

1969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pp. 69-90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asch, William

2000 *Niklas Luhmann's Modernity: The Paradoxes of Differenti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ckwitz, Andreas

2004 “Die Logik der Grenzerhaltung und die Logik der Grenzüberschreitungen: Niklas Luhmann und die Kulturtheorien”, pp. 213-240 in *Luhmann und die Kulturtheorie*, edited by Günter Burkart & Gunter Runkel (Frankfurt a.M.: Suhrkamp).

Robbins, Lionel

1932[1984]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Rueschemeyer, Dietrich

1977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Efficiency, and Pow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 1-25.

Sawyer, R. Keith

2002 “Emergence in Sociolog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Mind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Sociologic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3: 551-585.

Schatzki, Theodore R., Karin Knorr Cetina & Eike von Savigny

2001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Schiltz, Michael

- 2007 “Space is the Place: The *Laws of Form* and Social Systems”, *Thesis Eleven* 88, 8: 8-30.

Schimank, Uwe

- 2001 “Differentiation: Social”, pp. 3663-3668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6,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 Paul B. Baltes (Amsterdam: Elsevier).
- 2005 *Differenzierung und Integratio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akteurzentrierten Differenzierungstheorie 1* (Wiesbaden: VS Verlag).
- 2006 “Differentiation”, pp. 141-142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Austin Harrington, Barbara L. Marshall & Hans-Peter Moller (London: Routledge).

Schmidt, Siegfried J. (ed.)

- 1987 *Der Diskurs des radikalen Konstruktivismus* (Frankfurt a.M.: Suhrkamp).

Seidl, David

- 2005 *Organisational Identity and Selftransformation: An Autopoietic Perspective* (Burlington, VT: Ashgate).

Seidl, David & Kai Helge Becker (eds.)

- 2005 *Niklas Luhmann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Herndon, VA: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Simon, Fritz B.

- 2004a *Gemeinsam sind wir blöd? Die Intelligenz von Unternehmen, Managern und Märkten* (Heidelberg: Carl-Auer).
- 2004b *The Organisation of Self-Organisation: Foundations of Systemic Management*, tr. by Sally Hofmeister (Heidelberg: Carl-Auer).
- 2005[2002] *Die Familie des Familienunternehmens: Ein System zwischen*

Gefühl und Geschäft, 2nd edition (Heidelberg: Carl-Auer).

2007[2001] 《徹底的市場經濟：系統管理基礎》，張東輝、陳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譯自：*Radikale Marktwirtschaft: Grundlagen des systemischen Managements*)

Simon, Fritz B., Rudolf Wimmer & Torsten Groth

2005 *Mehr-Generationen-Familienunternehmen: Erfolgsgeheimnisse von Oetker, Merck, Haniel u. a* (Heidelberg: Carl-Auer).

Simon, Herbert A.

1955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1: 99-118

1972 “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p. 161-176 in *Decision and Organisation: A Volume in Honor of Jacob Marschak*, edited by C. B. McGuire & Roy Radne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 Co.).

1982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melser, Neil J. & Richard Swedberg

1994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y”, pp. 3-26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pencer Brown, George

1969 *Laws of For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93 “Self-reference, Distinctions and Time”, *Teoria Sociologica* 1, 2: 47-53.

Sorokin, Pitirim A.

1979 “Social Differentiation”, pp. 406-409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4, edited by David L. Sills (New York: Macmillan).

Stäeheli, Urs

1997 “Exorcising the ‘Popular’ Seriously: Luhmann’s Concept of Semantic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7, 1: 127-145.

- 2000 “Writing Action: Double Contingency and Normalization”, *Distinction* 1: 39-48.
- 2001 “Fatal Attraction? Popular Modes of Inclusion in the Economic System”,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8, 1: 110-123.
- 2003a “The Popular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Cultural Studies* 17, 2: 275-299.
- 2003b “Financial Noises: Inclusion an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9, 2: 244-256.
- 2007 *Spektakuläre Spekulation: Das Populäre der Ökonomie* (Frankfurt a.M.: Suhrkamp).

Stichweh, Rudolf

- 1988 “Inklusion in Funktionssystem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pp. 261-293 in *Differenzierung und Verselbständigung: Zur Entwicklung gesellschaftlicher Teilsysteme*, by Renate Mayntz et al. (Frankfurt a.M.: Campus).
- 2000a “Konstruktivismus und die Theorie der Weltgesellschaft”, pp. 232-244 in *Die Weltgesellschaft: Soziologische Analysen* (Frankfurt a.M.: Suhrkamp).
- 2000b “Systems Theory as an Alternative to Action Theory? The Rise of ‘Communication’ as a Theoretical Option”, *Acta Sociologica* 43:5-13.

Swedberg, Richard

- 1986 “The Critique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Perspective During the Paradigm Cris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29, 2: 91-112.
- 2003 *Principl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ang, Chih-Chieh

- 2004 *Vom traditionellen China zum modernen Taiwan: Die Entwicklung*

funktionaler Differenzierung am Beispiel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und des Religionssystems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 2007 “Struktur/Ereignis: Eine unterentwickelte, aber vielversprechende Unterscheidung in der Systemtheorie von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13, 1+2: 86-98.

Teubner, Gunther

- 1984 “Das regulatorische Trilemma: Zur Diskussion um post-instrumentale Rechtsmodelle”, *Quaderni Fiorentini: per la storia del pensiero giuridico moderno* 13: 109-149.
- 1986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1992 “Die vileköpfige Hydra: Netzwerke als kollektive Akteur höherer Ordnung”, pp. 189-216 in *Emergenz: Die Entstehung von Ordnung, Organisation und Bedeutung*, edited by Wolfgang Krohn & Günter Küpper (Frankfurt a.M.: Suhrkamp).
- 1993 “The Many-Headed Hydra: Networks as Higher-Order Collective Actors”, pp. 41-60 in *Corporate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Changing Structures and the Dynamics of Regulation*, edited by Joseph McCahery, Sol Picciotto & Colin Sco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a “Double Bind: Hybrid Arrangements as De-Paradoxifier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2: 59-64.
- 1996b “Globale Bukowina. Zur Emergenz eines transnationalen Rechtspluralismus”,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15: 255-290.
- 1996c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Dartmouth Gower).
- 1997a “The King’s Many Bodies: 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 *Law & Society Review* 31, 4: 763-787.
- 1997b “Breaking Frames: The Global Interplay of Legal and Social System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5: 149-169.

1998 “After Privatization? The Many Autonomies of Private Law”, *Current Legal Problems* 51: 393-424.

2001 “Economics of Gift - Positivity of Justice: The Mutual Paranoia of Jacques Derrida and Niklas Luhman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 1: 29-47.

2004 “Global Private Regimes: Neo-Spontaneous Law and Dual Constitution of Autonomous Sectors?”, pp. 71-87 in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Karl-Heinz Ladeur (Burlington, VT: Ashgate).

Teubner, Gunther & Alberto Febbrajo (eds.)

1992 *State, Law, and Economy as Autopoietic Systems: Regulation and Autonomy in a New Perspective* (Milan: Dott. A. Giuffrè Editore).

Teubner, Gunther & Michael Hutter

2000 “Homo Oeconomicus and Homo Juridicus – Communicative Fictions?”, pp. 569-584 in *Corporations, Capital Markets and Business in Law*, edited by Theodor Baum, Klaus J. Hopt & Norbert Horn (Dordrech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Hijikata, Toru & Armin Nassehi (eds.)

1997 *Riskante Strategien: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des Risikos* (Wiesbaden: VS Verlag).

Thyssen, Ole

2004 “Luhmann and Epistemology”, *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 11, 1: 7-22.

Uzzi, Brian

1996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4: 674-698.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1: 35-67.

Varela, Francisco J.

1975 “A Calculus for Self-Re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 2: 5-24.

von Foerster, Heinz

1984[1976] “Objects: Tokens for (Eigen-)Behaviors”, pp. 274-285 in *Observing Systems* (Seaside, CA: Intersystems Publications).

von Foerster, Heinz & Bernhard Pörksen

2004 *Wahrheit ist die Erfindung eines Lugners: Gespräche für Skeptiker* (Heidelberg: Carl-Auer-Systeme).

Webb, Julian

2004 “Turf Wars and Market Control: Competition and Complexity in the Market for Leg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11, 1 & 2: 81-102.

Weber, Max

1980[192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Tübingen: J. C. B. Mohr).

White, Harrison C.

1981 “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517-547

1992 *Identity and Control: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Network Switchings and Bayesian Forks: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Social Research* 62, 4: 1035-1063.

2008 *Identity and Control: How Social Formations Emer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arrison et al.

2007 “Networks and Meaning: Styles and Switchings”,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13, 1+2: 543-555.

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78[1929]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on Cosm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Willke, Hemult

1987 “Differenzierung und Integration in Luhmanns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pp. 247-274 in *Sinn, Kommunikation und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edited by Hans Haferkamp & Michael Schmid (Frankfurt a.M.: Suhrkamp).

Zafirovski, Milan

2000 “An Alternativ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Value: Price Form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4, 2: 265-295.

2001 *Exchange,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Elemen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Zelizer, Viviana A.

1989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Special Mon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2: 342-377.

1994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Pin Money, Paychecks, Poor Relief, and Other Currenc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Payment and Social Ties”, *Sociological Forum* 11, 3: 481-495.